

浪漫台三線藝術季

# ROMANTIC ROUTE 3

2019 10.19-12.15

[www.romantic3.tw](http://www.romantic3.tw)



客家委員會  
Hakka Affairs Council



優選影片精選線上看

LINE TV & 公視+

f 感動，無所不在

 新北市政府  
New Taipei City Government

新北友好市  
**400+**  
新北市400萬人口

新北市政府新聞局



新北市紀錄片獎  
2019 系列活動

感動

無所不在

# 目錄

## 會長的話 01

### 年報主題一：六四現場的台灣記者們

---

- 「我當時，可能真是做對了一件事」——  
那個春夏之交，在「北平」的台灣記者們（上） . 李志德 09
- 「記者在現場」的意義是什麼？——  
那個春夏之交，在「北平」的台灣記者們（中） . 李志德 16
- 自認「逃兵」的謝三泰，30年後解封的民運照片——  
那個春夏之交，在「北平」的台灣記者們（下） . 陳亭聿 26

### 年報主題二：假新聞無國界

---

- 在民主癱瘓之前——  
從買粉專事件看台灣該補強的網路學分 . 劉致昕 32
- 深入全球假新聞之都，  
看「境外網軍」是如何煉成的？ . 劉致昕 41

### 特刊

---

- Is It Inherently Unsustainable to Run a Local,  
English-Language Media Outlet in Taiwan? .Brian Hioe 45
- Press Freedom? Daphne K Lee 48
- 2019 無國界記者新聞自由指數 —  
政治局勢變化影響亞太地區之新聞自由 . 無國界記者組織 53
- 記者手記：  
在新聞現場，如何應對風險，保護自己？ .Lulu 60



## 會長的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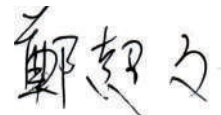
2018 到 2019 年，全球局勢詭譎地變動著，台灣身為世界的一員，自然也不能屏除其外。在此之中，媒體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無論是真知的傳遞或是假訊息的惡意散播，都迅速而深遠地影響了政治與社會變化，新聞的話語權便成為兵家必爭之地。

維護新聞自由以傳達真知，再藉以提升媒體從業人員的權益，長久以來一直是台灣新聞記者協會耕耘的標的，在現今的景況下，這些訴求顯得益發重要。所以本次《2018 台灣新聞自由年報》的編選核心，即在真相的追尋。

本次年報刊載了兩項主題：「六四現場的台灣記者們」、「假新聞無國界」。藉由這些系列報導，可以回顧往昔，並展望未來。從過去新聞現場到如今的網路世界，從台灣、中國、到世界各地，各種變化多端的場域，報導真實事件與杜防假消息帶來的危害，一直是新聞得以引領文明進步所須堅守的價值。

年報特刊中，兩篇外語記者論及台灣英語媒體在地化、台灣的新聞自由等議題，以在地化的方式全球化，是語言之所成為接軌世界脈動的必備工具。與記協合作的組織「無國界記者」提供的專文，探索亞太地區的新聞自由與政治局勢密不可分的相互影響性。最後一篇記者手記，給予記者們在採訪風險現場時的安全參考。2019 年中以後的香港反送中抗議現場，使台灣媒體從業人員拉近與前線風險的距離，台灣記協亦看重前線記者的人身安全與勞動權益，期望文章能給予同業們實質的助益。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會長



## 「我當時，可能真是做對了一件事」

——那個春夏之交，在「北平」的台灣記者們（上）

李志德



當年曾採訪六四事件的記者高源流。攝：陳焯輝 / 端傳媒

「這是我第一次去大陸，」高源流生平第一次踏上大陸就是為了採訪，而且是舉世震動的六四事件。

高源流當時是台灣《聯合報》地方新聞中心副主任，以往主跑司法、社會新聞，和國際、大陸新聞距離很遠。之所以在六四時被派到北京，高源流回憶從五月學生運動開始，每天編前會總要花很長時間討論最新情況。五月下旬，解放軍將動手鎮壓的傳聞無日無之。總編輯開始物色資深記者增援北京。「他說要有採訪經驗，懂得趨吉避凶，總編輯剛講完，眼睛就一直看著我，大家就只看著我，…… 就是你，這個是你最有經驗，你去！」

高源流訂下六月三日下午飛香港轉北京，同行的還有大陸新聞中心主任蒲叔華。落地後發現預訂飛北京的班機停飛，會不會、什麼時候恢復沒有人知道，只能在機場坐等。正在回報，台北告訴他解放軍已經進城鎮壓，當下情況危險，要求高、蒲兩人先回台北。

「我人都在香港了，你要我再回去，這不是臨陣脫逃嗎？既然來了，就再等等看。」

到晚上九、十點，班機恢復，上了機「我我前後坐的都是大陸人，他們還很不安的問我，你怎麼這時要去北京？我都不敢講為什麼，只說去做生意。」

「北京機場燈都是暗的，也沒有什麼海關的人。」在行李轉盤邊，一位「個體戶」來拉生意，問高源流兩人要去哪裡。進市區？對方回答今晚不可能，只能到接近市區的麗都飯店，天亮再見機行事。「那時候北京幾乎失去秩序，沿路都是解放軍的車子，軍車、裝甲運兵車，也有坦克車。我一生沒有見過這麼多軍車」。高源流從車窗往外看，有些解放軍士兵就在軍車底盤下和衣就寢。載他們的「個體戶」司機邊開車，邊喊「解放軍萬歲！」「解放軍萬歲！」還把手伸出車窗揮動著。

為什麼要這麼喊？「他們說這樣比較容易通過」。果然沿途沒有任何人盤查，一路開到麗都飯店。

### 行李轉盤邊的「個體戶」

胡元輝也是在行李轉盤邊遇上「個體戶」司機招攬生意。他比高源流晚三天，六月七日晚間降落首都機場。胡元輝當時是《自立晚報》採訪主任，他也是第一次到北京，來接下駐京記者黃德北的棒子。黃德北從學運初期就在北京採訪，經歷廣場抗議、學生絕食、解放軍進城鎮壓，身心俱疲，而且經費用盡，有些帳單需要胡元輝來「解決」。



胡元輝。攝：陳焯輝 / 端傳媒

胡元輝和高源流受訪時不約而同提到，自己是帶著上萬美元進大陸，有現金、有旅行支票，在1989年，這筆錢在台灣已經可以付買房子的訂金。除了現金，兩人也都提他們另外還帶著十來

個「金戒指」、「金項鍊」，以備碰上「留下買路錢」之類的不時之需。

胡元輝和個體戶司機談好的進城車資是 500 美元，原本就很窄的車裡，胡元輝坐在中間，左右各有一位「乘客」，胡元輝問這些人是誰？司機只答「他們可以保護你」。車子開出機場不久，忽然一轉彎開進樹林裡，停在一座貌似農舍的住宅前，司機和同乘的「乘客」問他：身上有沒有美元？

「車子一轉彎我就知道大事不妙，我想奪門而出，但也只能『想』，因為我的腳在發抖。」他暗忖著，自己把一萬美元分三個地方放，皮夾裡是 800 元，其它在身上另處和箱子裡。他抽出皮夾，告訴司機，有 800 美元。

「好，我們跟你『換錢』」，按當時的市場價格，100 美元應該兌 800 元人民幣，但司機的「匯率」是 100 美元兌 200 人民幣。「換錢」之後，個體戶司機將胡元輝載到城外一處飯店附近，一見燈光就趕他下車，胡元輝自己拎著行李走到飯店。

胡元輝事後回想，自己之所以沒有碰上「更壞的事」，可能是因為他最初跟司機說，自己是應作家協會邀請來參加活動，市區裡有領導正在等著我。司機忌憚如果胡元輝沒有赴約，恐怕引發公安強力調查。

「不可能說是來採訪，但我行李裡頭有一大疊稿紙，就跟他們說我是作家好了！」胡元輝笑著說。

## 只要在大陸的記者，都到北京報到

六月四日一大早，高源流搭上同一部車繼續往市區走，通往市中心的路上有不少路障，「那個司機很厲害，到處轉，遍地都是碎石頭、碎鐵塊，撞爛的鐵欄杆。沿路可以看到被燒的卡車、軍車，有些還在冒火、冒煙……。」

和同事會合前，高源流和蒲叔華請司機先開到北京飯店，這裡離天安門廣場只有五、六百公尺，兩人希望先看一看現場情況。一夜清場之後，廣場四周仍然氣氛嚴峻，還沒走到天安門廣場就撞上一條封鎖線，軍人趴在地上，槍口朝外。成排的軍人後頭是成排的坦克。高源流看著看著，臥姿的解放軍突然向兩邊散開，坦克車向著群前進，抗議者紛紛走避，邊逃邊罵。這時車上的機槍突然打響了，高源流連忙拉著司機跟著群眾避開，他說，所幸它是對著天空開槍，沒有打中或打傷人。

如果在舊報紙上點數記者的名字，會認為當時《聯合報》為了北京學運派出了龐大的採訪團。但其實並不是，所有參與報導的記者，只有王震邦是為了採訪學運而到北京，其它都是因為不同的

事件恰好在大陸，都被要求留在北京。例如採訪前蘇聯總書記戈巴契夫（戈爾巴喬夫）訪華的孫揚明和翁台生、採訪台灣財政部長郭婉容出席亞洲開發銀行年會的陳承中、參加其它行程的藝文組記者景小佩等等。原本到福州採訪偷渡集團的汪士淳，也在五月中到北京加入採訪，六月四日凌晨，他在天安門廣場留到最後一刻，報導了學生、教授和市民最後撤出廣場的情形。

有趣的是，1989年儘管執政的中國國民黨已經解除戒嚴，但兩岸關係體系尚未完整建立，中共統治大陸的事實還不完全被政府承認。因此《聯合報》依照政府規定，記者署名仍是「北平報導」。

### 「肖斌事件」之後，所有人都沈默了

胡元輝所屬的自立報系有《自立早報》和《自立晚報》兩份報紙，是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非常重要的反對派報紙。1987年9月，自立報系率先衝撞政府禁忌，派記者李永得、徐璐前往大陸採訪，寫下台灣新聞史上的重要一頁。

自立報系這次的規劃是在鎮壓之後加派胡元輝到北京，另一位記者到上海。胡元輝在北京採訪六四後續，之後北京交給徐璐，胡元輝自己轉往成都，沿長江往東一路採訪；到上海的記者南向採訪沿海城市。自立報系希望藉助這個行程，比較完整描寫當時中國各地情況。不過有於六四之後的嚴厲氣氛，這兩條路線都沒有走完。

六月八日一早，胡元輝雇了一部車前往北京大學，車費要價100美元。他想試試能不能訪問到一些市民對事件的看法。到了北京大學外，還沒有進學校，就看到人行道上擠滿了市民，人人都在高談闊論，找受訪者完全不是問題，甚至「你不必開口問，只要靜靜旁聽，都可以聽到一堆可以寫報導的材料。」

但情況在「肖斌事件」後隨即改變了。肖斌是一名來自大連的工人，六四事件時他在北京出差，目睹天安門事件。之後他接受美國ABC電視台採訪，講述了自己見到軍隊鎮壓的情況，包括推估的死傷人數。新聞一播出，肖斌隨即遭到大連警方逮捕，日後被判刑十年。

「電視上就出現一張字卡、一條新聞：『造謠大王肖斌抓到了』，從那時開始，路邊再也聽不到有人談論這件事，也不會有人接受你的採訪了。」胡元輝說。

### 蹲著就不要站著，該趴著就不要蹲著

軍隊進城鎮壓後的幾天，北京城氣氛依然肅殺。高源流和孫揚明曾經目睹一輛戰車在馬路上，士兵以機槍射擊一幢房屋，子彈在牆上打出一個一個彈孔，水泥碎屑四濺。孫揚明說，戰車攻擊民



宅的原因，是裡頭疑似有人持槍射擊士兵。

碰上這種情況，「大家都在台灣都當過兵的，該蹲著就不要站著，該趴著就不要蹲著。」孫揚明曾在六月四日凌晨，遇過一次「一股很熱的風擦過臉頰」，是不是子彈，他也不敢肯定。另一次，一顆催淚彈就在他腳前炸開，逼得他閉住氣，摸到身邊的腳踏車，拼命騎出幾十公尺才換了口氣。孫揚明回憶當時語氣輕鬆，說那時並不太擔心自己真的會有生命危險。



《聯合晚報》六月五日的六四報道。攝：陳焯輝 / 端傳媒

高源流也說自己不曾有過「接近死亡」的感受。最驚悚的一次經歷，是軍隊鎮壓後兩、三天，他和孫揚明騎車出門採訪，騎過紫禁城靠東側的圍牆，遠遠看到路的那一頭是兩輛坦克車，一大隊士兵站在兩側，整條路只剩中間一條通道。

要不要往前走？高源流說，就在他倆進退兩難時，對向一位老人騎著車過來。「他低著頭一直騎，都沒有看我們，騎到我們旁邊嘴裡就念著：不要回頭，不要回頭，不要回頭，不要回頭……」得到老人的「忠告」，兩人硬著頭皮繼續往前，騎過坦克車和解放軍中間時，「我第一次感覺到『毛骨悚然』這個字，那些解放軍可能一進城以後都沒有休息，全身髒兮兮，眼睛都是血絲，他們就這樣一直看著我，我真的是背脊發涼。」「你那時穿著是什麼樣子？」「一看就知道不是大陸人的樣子，我腳上還是一雙NIKE球鞋」，高源流回答。

### 衝突的痕跡迅速抹平

天安門事件期間，不少外地青年學生、工人和民眾也到北京參與聲援。胡元輝曾經搭上一趟往天津的火車，看看這個左近北京的城市，有沒有留下民主運動的跡象。

車廂裡有不少年輕人，胡元輝攀談了幾位，有人就提到自己是進北京參加運動的學生。就在談話之間，車廂裡出現三名軍警，「隨機抽點」盤查行李。「『你，打開行李』，大概三個人就有一個被點到，必須打開行李讓他們檢查。」胡元輝親眼目睹，一位青年的行李箱打開之後，發現裡頭有一張運動期間的傳單，立刻就被帶走。「如果是我被點到，那真的完了。他只有一張，我行李裡有二、三十張啊。」

結束了在北京階段的採訪，胡元輝開始走預訂的成都行程。但當時國台辦嚴格監控在大陸台灣記者的動向，怎麼可能隨便讓他前往成都？胡元輝說，那時是以採訪「都江堰」和「貓熊保育基地」的名義提出申請，而國台辦也真的准了，但同時也派人隨行。成都是六四事件期間另一個發生激烈衝突和嚴厲鎮壓的城市，當時就有傳聞位於市區的「人民商場」整個被燒掉；錦江賓館也發生激烈衝突等。只是在隨行中共官員的監控下，胡元輝除了老老實實採訪「都江堰」和「貓熊保育基地」外，沒有辦法獨立進行任何採訪，看著手上可以聯絡採訪的電話，一個也不敢打。

胡元輝的確住進了錦江賓館，傳聞裡在衝突中被打碎的大廳吊燈的確不在了，但其它地方看不出任何異狀。車子路過人民商場時，土地一片平整，偌大的商場就像憑空消失了一樣，完全沒有暴力鎮壓的痕跡。

這趟不成功的成都採訪之行一直被胡元輝擺在心裡。他說，在後來的採訪裡，他有機會採訪許多大陸人士，有一次真的碰到一位來自成都的教授，胡元輝談起 89 當年的傳聞與報導，那位教授回答，當年自己就是參加抗議的學生，錦江賓館和人民商場的事，大致都是事實。事後這一席談話更讓胡元輝感慨，極權政府抹除社會記憶的效率，可以如此驚人。

### 長長的撤僑車隊直奔機場

在北京，聯合報採訪團原本住在和平賓館。高源流回憶，六四後全市氣氛肅殺，住客漸漸搬走，賓館到最後只剩下採訪記者。有一天凌晨三點，門外有人拍門要求查房，高源流回憶，進房公安人員荷槍實彈，上上下下把房間翻了個遍，但沒有查扣任何裝備物品。當時採訪團發稿回台北全靠一台傳真機，當時就在床頭，但高源流猜測，當時傳真機還是非常罕見的東西，公安應該不知道這是什麼，或者以為是旅館物品，才逃過被沒收的噩運，採訪團也能夠繼續發稿。

經過查房之後，採訪團決定搬到建國飯店。當時幾乎所有還留在北京的外國記者都住在這裡。牆上貼滿了各種語文打印的使館通告。西方記者進進出出，晚間還有菲律賓樂隊演奏，和門外的北京城彷彿是兩個世界。



六四事件期間，西方國家也在北京啟動撤僑作業，「那個情景就像二戰或者逃難電影一樣」，高源流說自己生平第一次見到撤僑，「大使館他們通知僑民到大使館報到，之後就派出車隊，一次總有十多部，有轎車有廂型車。是英國，車頂、側面就貼英國國旗，還有美國國旗、日本國旗」，時不時就見到一支支車隊呼嘯而過，直奔機場。在機場，主要西方國家的撤僑工作似乎都由美國負責，美國國務院在機場設了一處櫃台，停機坪上專機待命，「一坐滿就起飛往東京，像巴士一樣」。

說起撤僑，高源流地沈默了半晌，說起一件沒有公開過的事。

「事實上我們那時在和平賓館，『收容』了一對帶著小嬰兒的夫妻。」高源流說，這件事並不是採訪團每個人都知道，因為這家人非常低調地住在飯店裡。這家的男主人，是一位中國公費留學生，學成返國服務不久，妻子是台灣人，曾經是聯合報系員工，在美國認識了先生，兩人在美國結婚，生下一個孩子，一家人一起回中國生活。

高源流說，這家人的男主人在學運期間，出於滿腔熱血參與了部分活動，六四之後深怕遭到秋後算帳，妻子於是出面向採訪團裡的老同事求助，躲進了和平賓館。

「我在機場的時候一看美國外交官有人在那邊，我就想到這幾位可以送走」，回飯店後，高源流問清楚孩子是在美國出生，確實有美國籍，就說動男女主人同意，第二天收拾行李，一大早就用採訪團的車將他們送到機場。

一進機場直奔櫃台，高源流拿出孩子的護照，問「這位能不能撤僑」？美國官員回答當然可以，細看發現是個小嬰兒，忙問「他的爸媽呢？」這時男女主人上前，各自拿出護照，「他們一家人三種護照：媽媽拿中華民國護照，爸爸拿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小baby美國護照。」登記結束，一位美國官員引著三人往出境通道走，「他們走在那條通道上，我一直提心吊膽，就怕有人會把他們擋下來」，直到三人走到盡頭，準備上飛機，「他遠遠的這樣轉身過來，跟我揮揮手，我也跟他揮揮手，從此我再也沒見過他們。」

這個孩子，現在應該也過三十歲了？「對！差不多。我跟你講，如果沒有送走他，他後來的命運我就不曉得了。後來我常常想到這件事情，想著我當時，可能真是做對了一件事情。」

本文獲網路媒體《端傳媒》授權刊登。

端傳媒：<https://theinitium.com/>

## 「記者在現場」的意義是什麼？

——那個春夏之交，在「北平」的台灣記者們（中）

李志德

王震邦家裡仍然有兩整書櫃的「六四書」，他順手抽起一本，翻動之間，幾張夾在書裡的紙落在地上，撿起來細看，是這本書製作之初，日本出版社有意接洽翻成日文，請求代轉王丹授權的傳真信函。

架上的六四書大多數是絕版「珍本」，王震邦仔細挑了兩、三本重覆收藏的遞給我，「這送你吧，有興趣帶回去研究」。但對我始終盯著的另一本，王震邦正色說道：「這不能給你，我只有這一本了」。

《六四的內情未完成的涅槃》，作者包遵信，八九民運期間被官方定性為「幕後黑手」。廣場鎮壓之後，包遵信逃亡了一陣子，與王丹先後被捕，判刑五年。王震邦受訪時反覆提到這位八十年代在中國知識界擁有巨大影響力、在六四鎮壓之前力勸學生停止絕食，撤出廣場的學者。

王震邦最早認識包遵信是在一九八八年訪問北京大學的行程，當時的中國，改革開放帶來的思想解放達到最高潮——當然，那時不可能有人知道八九年將發生什麼事，自然意識不到八八年已經到了「最高潮」——王震邦受邀在北京大學演講，談兩岸關係。私下辦的沙龍，沒有海報宣傳，但仍然吸引滿座的學生。

在那趟行程裡，王震邦結識了包遵信、李澤厚和湯一介，也發回了方勵之的專訪和馮友蘭的直言不諱：

「現實經驗證明，今天全世界推動社會主義而由共產黨執政的國家，不是都在尋求改革？這說明了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並不如馬克思所說是科學的，而是空想的。」

1988年的北京行，讓王震邦採訪八九民運有了比較豐富的消息源。他也是《聯合報》當時在民運現場的記者裡，唯一一位專程為學運而到北京採訪的記者，而不像同報系其它記者，是因為其它行程之後留在大陸支援採訪。

「【特派記者王震邦／北平卅日電】北平各大學今天紛紛貼出了大字報，交相指責中共官方沒有和學生對話的誠意，參加對話的北大學生更慘遭大字報指名批鬥。」

在北大校園貼出的大字報以「忍無可忍」來形容學生對對話事件的憤怒，指責官方和學生的對話

是一小撮人的安排。並要求同學不要上當。

有的大字報則指出，對話層次不高，在沒有實質對話出現前，並有了具體的進展，絕不能停止罷課，廿九日的對話不過是一場聊天會，有的學生更指出，那是官員在向學生們示威，向學生訓話。」



王震邦。攝：陳焯輝 / 端傳媒

這是王震邦採訪八九民運的開端。用他的話說，那時民運處在「即將走出學校外」的階段。五月十二日，絕食靜坐即將開始，王震邦拍下北大教師在燕春園為絕食學生開的餞別宴。十三日他寫道：

「二千多名北平大學生今天誓言絕食，黃昏前陸續集結天安門廣場，……只見到處是「絕食」「絕食」的字眼，掌聲中聽到的是「絕食」「絕食」的呼聲，把上個月十五日胡耀邦去世後引發的學生抗議活動，推上了另一新高點！」

在部分學生發起絕食的同時，另有一批學生前往蘇聯駐北京大使館，「邀請」即將訪問北京的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戈爾巴喬夫）到北大演講，但使館回答戈巴契夫行程已滿，學生碰了個軟釘子。但八九民運確實因碰上戈巴契夫訪問北京，一時間得到全世界的關注。不少原本申請採訪戈巴契夫行程的記者，日後就直接留下繼續採訪學運，孫揚明就是其中一人。

孫揚明、王震邦和另一位聯合報記者汪士淳，是聯合報系六月三日當晚最靠近衝突現場的三名記

者。六月三日晚間，軍隊大舉進城的消息傳到和平賓館。孫揚明和汪士淳商量了一下，說好汪士淳進入天安門廣場留守；孫揚明騎腳踏車往沿著長安大街往西奔，尋找軍隊和民眾的接觸正面。王震邦則在南池子大街，隔長安大街觀察情況，事實上，當時再想接近廣場，也已經過不了長安大街。

在五日的報紙上，孫揚明發出了四日清晨的現場報導：

「凌晨一時正。戒嚴部隊從公主墳、木樨地沿西長安街強行推進，遭逢民眾強烈抵抗，有數十輛裝甲車被搶占後，澆上汽油燒毀，當時百姓歡聲雷動，不旋踵軍隊對空鳴槍警告，隨即傳來有人被部隊的子彈所傷，惟數目不詳。」

群眾開始撤退至民族宮前時再度聚集，以木棍、磚、石與土製汽油彈攻擊部隊，部隊則以催淚彈還擊，由於群眾勢張，部隊向後退撤約兩百公尺至民族飯店門口雙方展開拉鋸戰，一時間滿天磚塊、石頭與任何可能當武器的物品飛舞，部隊由於有頭盔、透明盾牌因此轉為有利，但由於向前衝鋒，因此至少有八人重傷，被送入民族飯店做緊急處理。」

三十年之後，孫揚明受訪時，大致準確地重現了當年自己筆下的這一幕現場，但時間讓他抽出了不同的元素，而他現在，更願意強調這些元素：



孫揚明。攝：陳焯輝 / 端傳媒

「部隊就一路拉進來，中間看到的其實不只是外傳的，坦克車嘩拉嘩拉一路打進來，那是過度簡

化了事件的真相。我們看到的是「打來打去」。所謂打來打去，是我們看到，或者聽到群眾拿著磚頭、石頭、木棍往解放軍丟，丟的同時還喊「衝」，幾個來回。部隊剛開始沒有動用熱武器，就是用槍，後來才動槍，這是我們親眼看到的。」

「打來打去」，看起來是「（軍隊、學生）各打五十大板」的評價，但孫揚明意欲與之對話的，是一種日益「善惡分明」的扁平敘事。訪談之間，他不斷追憶當年的諸多細節，反覆提醒歷史現場的複雜。例如前幾年曾有媒體報導，號稱引述「英國解密檔案」指出當年天安門廣場死亡超過萬人。孫揚明和當時在廣場留守到最後的汪士淳，特別發表一篇長文，描述當年在廣場所見的情況。至少就他們所見，最後清場階段在廣場上沒有人死亡。

在南池子大街的王震邦，也有同樣的判斷：

「整個廣場是我掃瞄的視野所在。我看不到任何衝撞性的行為或是動作，足以導致死人……那至於說有人睡在帳篷裡面就被輾過去的，我覺得在那個時候的情境裡面，不可能。除非他吃了藥，沒有人。我只相信有人幾天幾夜沒睡，我不相信有人在現場可以沈睡。」

「在街上解放軍有沒有開槍？當然有。有沒有打死人，當然有。但廣場有沒有？我們當時所見是沒有的。分辨清楚這些細節，對於理解當時那個複雜的情況，以及後來各方對運動的詮釋，非常重要。」孫揚明強調。

天安門廣場有沒有人死去？只是 30 年來諸多公案中的一起。孫揚明記得的還有：當年進城之時的解放軍，行經外交公寓時遭到槍擊，子彈來自樓上不明人士；六四之後，北京一處高樓也有子彈攻擊坦克車上的軍人，引來戰車開槍向這處民宅射擊。這些衝突、對抗的前因後果是什麼？時隔愈久，孫揚明愈覺得不該簡化箇中的關係。

如果把鏡頭再推一點，血腥鎮壓是最後的結果，但這結果是不是可以避免的？孫揚明和王震邦受訪時，不約而同提到在八九民運期間，從五月到六月，曾有兩次廣場上學生的抗議行動幾乎無以為繼，但一來當時「恰好」進來了大批外地學生；二則，每當討論學生「是不是該撤退」時，激進的主張總是壓倒一切，包括知識份子們到廣場勸退學生，結果也相同。兩輛相向而行的火車終於對撞。

王震邦受訪時這樣總結：「當時共產黨內的兩種力量，一是通過學生，取得自己這個路線更大的空間；另一條是控訴學生。這兩種力量互為擠壓。」而他想問，激進路線每每在關鍵時刻取得勝利，「究竟是誰扮演了這種角色？而這個角色的動能是從何而來？」

五月十三日，學生在天安門的絕食行動開始；隔天，包遵信連同一批著名學者到廣場與絕食學生



溝通，同時發表一篇《緊急呼籲》。首先要求中共中央承認學生是愛國、民主的行動，不秋後算帳，不採取暴力手段；但同時也呼籲學生「為了中國改革的長遠利益……懇請同學們發揚這次學潮中最可貴的理性精神，暫時撤離天安門廣場。」

改良派知識分子向左向右喊話，卻沒有一方理會他們。在清場之後的逮捕中，這些基本立場支持學生的學者、作家也同步落難。七月一日，在法國巴黎的「民主中國陣線」籌備處發布了六四後遭秘密逮捕的中國知識分子領袖的名單，包遵信「理所當然」在列，其它的還包括《光明日報》記者戴晴、《河殤》總撰稿人蘇曉康、王魯湘、《中國青年報》學校部主任李大同、上海《世界經濟導報》記者張偉國……等等。

對這一批改良派知識分子在六四之後的遭遇，王震邦為他們在憤恨不平，又滿懷虧欠。這樣的心情，與他對學生運動「應退未退」的遺憾和批判互為表裡：

包遵信六月下旬被捕，八月傳出被「雙開」的消息。「後來包遵信在牢裡不是認罪了嗎，還有人罵他。我說：沒有坐牢的人，沒有權利罵人。」王震邦說。

「包遵信坐牢出來之後窮途潦倒，我去看他，我對他有一種虧欠感。」說起那一年的採訪團隊拿下了當時台灣新聞界最高榮譽的金鼎獎，王震邦聲音變得低沉，「他坐牢了，我寫的新聞得獎了，這算什麼？！」

過去三十年來，王震邦說自己幾乎不曾受訪。而問他認為記者在現場的意義是什麼？王震邦認為，意義在於：在一個歷史激烈變動的現場，能參與進去，這不是一般人有的機會，因而那樣的經驗帶來的反省力量也異常巨大。

但王震邦不樂於訴說這些，或者不樂於簡單地訴說。因為太簡化的表述，「就像魯迅說的，吃人血饅頭。這個吃人血饅頭，就一個悲劇來講的話，（記者這一行）就變成殯葬業而已了。」

時隔三十年，王震邦大概可以比較無所顧忌地談，當時在北京，包遵信帶他進入許多新聞現場；戴晴帶他到了一處「豆花庄」，出入其間的，有教授、記者、政治人物的幕僚……在民運期間，這裡是各路人馬交換信息的中心，不少報上的獨家新聞都從這裡來。讓王震邦津津樂道的一次，是趙紫陽辭職，他就是在豆花庄裡聽到消息，再觀察趙紫陽會見戈巴契夫的談話內容，覺得八、九不離十了就出手，之後美聯社也證實跟進報導。劉曉波被捕的消息，也來自這間豆花庄。

在八九民運期間，真消息確實有，但假訊息更多。例如鄧小平已死、王丹傷重不治……等等，事後都證明是假消息。甚至會有這樣的信息見諸報端：

「親趙紫陽的第廿八軍已開抵北平，今天下午並派出戰車與十兵，與親楊尚昆的第廿七軍在北平西邊主要街道上，捉對廝殺。」

或者

「南苑空軍基地。一名上校級指揮官和政委被戒嚴部隊司令部扣留，於是三十八軍兩個營拒絕撤出，戒嚴部隊便在清晨派出裝甲部隊封鎖空軍基地所有通道。基地官兵和三十八軍團結一致，聲稱反對『楊家將』和打倒李鵬。」

王震邦和六四之後進入北京採訪的《自立晚報》記者胡元輝，都提到了當時訊息滿天飛，但真假難辨的情況。王震邦坦言，很多新聞是「餵」的，「哪條新聞是被餵的，發稿的人心知肚明，而且還不能不發，有時甚至挺高興的，謝謝餵食的人。」

假消息見諸報端，如果不是因為利益交換，那就是記者對事件已經有道德判斷，一廂情願地從「應然面」做文章，專門選符合自己期待的訊息，但和真實情況完全不同。例如「共軍內戰」這類新聞。

胡元輝則說，那時「自己找上門」的關係確實不少，供來的信息真真假假，不要說查證，連第二消息源都沒有。所幸那時自立報系並不盲目要求記者「拼獨家新聞」，因此舉凡這類訊息，他可以只留筆記本上，不必發稿。

信息採取的偏失，事實上和消息來源有關，王震邦就坦言，會多用學生和自由派知識分子提供的消息的主要原因之一：「學生們願意和我討論訊息，願意和我討論，官員不會這麼做的」。

而一個更大的情境是，在整個八九民運裡，學生儘管人多，但就是這麼弱勢，面對著如此強大的國家機器，記者會不會出現一種心態，自動就站到學生這邊來？

「當然有，包括我在內。」王震邦坦率承認。

更有甚者，「在這麼一個混亂、動盪、強者和弱者如此分明的情境下，一個記者會不會、能不能跨出採訪工作的「紅線」？不管是主動去救死扶傷，或者回應別人的求助？」

胡元輝被問道這個問題時，語氣變得非常緩慢、猶豫而不確定。他說自己確實知道民運期間有外國記者參與後來的民運人士救援工作，但台灣記者並沒有。但即使記者不主動參與，也有被動遇到別人求助的情況。



「我不敢確定我一定會說『NO』，因為這是一個……這是一個天人交戰的課題。它牽涉到的是一個人的生命安危。」胡元輝說，一般做法是幫忙把求救訊息傳遞給真正在進行援救的人，「我也許就會這麼做，而不直接成為援救者。」但胡元輝也坦承，「我不在那個情境裡，我也不敢說一旦真的面對那個情境裡，我會怎麼做。」

該怎麼評價八九民運？孫揚明的答案是：目前沒有辦法。

「要再等三十年，六十年以後回過頭來看這個事情。」他認為，目前談這件事，還有太多的個人、黨派乃至於國家的力量糾纏在中間。必須再等一段時間，這些人、事和關係慢慢都遠去或者逝去了，到時才可以從一個比較凌空、沒有個人情感的角度出發，給它一個比較好的或公正的評價。

八九民運的結果則重擊了胡元輝。他說，這場採訪讓他親身經歷了一個巨大的歷史轉折點。他說，那時自己原本對中國有一份樸素的期待，希望走向自由經濟、民主開放。但六四事件活生生地向觀察者展示，這些期待中國改革、變化的可能性，如何硬生生地被共產黨切斷。抗爭者追求民主和自由的聲音，如何可以在一夜之間被消失；就如同他在成都所感受到的，所有的人都知道幾天內發生過一場抗議行動，帶來流血鎮壓。但所有的跡象，都可以在極短時間被抹除，高壓政治會變得如此的有效。胡元輝說，這一段經歷令他「驚駭莫名」。

王震邦沒有給出直截了當的答案，但從他對包遵信和一班改良派知識分子的虧欠之情，或許可以爬梳出他真心認同的狀態，是一個由八十年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諸如包遵信、湯一介、戴晴、嚴家其、蘇紹智、任畹町、蘇曉康、方勵之……引領思潮和改革的中國。如果這樣的期待成真，現今的中國會是什麼樣子？

但無奈的是，歷史就是在一九八九年六月轉了彎。

本文獲網路媒體《端傳媒》授權刊登。

端傳媒：<https://theinitium.com/>

## 自認「逃兵」的謝三泰，30年後解封的民運照片 ——那個春夏之交，在「北平」的台灣記者們（下）

陳亭聿

「北京部分地區戒嚴後，報社一直叫我回台灣，我請求好幾次讓我留下。沒用。」台灣攝影師謝三泰說，「他們斷絕我的經濟來源，當時住飯店、吃、喝用的都是外匯券，人民幣上蓋個章，就能賺我們二十多倍的匯差。我一下就沒錢了，沒錢就沒轍，只好回來。」

「我拍的最後一張照片，是民眾朝毛澤東像潑漆的照片。」回台灣的十天後，天安門廣場的學生慘遭血洗，八九民運從此成了謝三泰心裡永遠的痛。這30年來，他選擇塵封這批照片及回憶，至今講起這事，他還是語帶悔恨，「我覺得自己是個逃兵。」

就在八九學運的兩年前，台灣開放民眾到中國探親，同樣在1987這一年，謝三泰進了《自立晚報》擔任攝影記者。同年9月，他在桃園機場的候機室拍下同事徐璐、李永得和發行人吳豐山的照片，待徐、李二人搭機離台，回程車上，吳豐山才神祕兮兮地跟他揭曉，「三泰，我們正在執行一項歷史性的任務。」問任務為何，吳笑稱，「到中國。」

### 「我在台灣跑街頭運動，沒想到北京居然也有街頭運動可以跑。」

1987年，《自立晚報》成為首個進入中國的台灣媒體，當時是非法行動，報社保密到家。事後更引發徐李二人回台被移送法辦的軒然大波，最終獲判無罪，二人儼然成為記者界的明星。「從小到大台灣教育很大一部分都是在教你中國歷史和地理，又一直被灌輸說他們很窮，都在啃樹皮。」彼時才30歲的謝三泰直言自己也很好奇，「我真的很想親眼看看它到底是長怎樣。」

1989年4月17日，謝三泰再度受派機場，只是這一次他不是到候機室拍照而已。當時台灣政府除了放寬探親，終於也開放媒體進入中國採訪，「我們是第一批合法進入中國的台灣記者。」謝三泰從報社接獲指令，要去對岸拍攝亞青盃體操賽、亞洲開發銀行年會、前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戈爾巴喬夫）訪中行程。亞銀年會台灣由時任財政部長郭婉容出席，這是第一位到中國出席國際會議的台灣政府官員，當時倍受注目。

就在採訪團出發前兩天，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心臟病發猝逝，北京高校學生自發悼念，開始在天安門廣場集結。知有此情，謝三泰自香港轉機北京後，一落地便忙和講好集體行動的採訪團分道揚鑣。他人還拎著行李，已跳上同家報社的文字記者黃德北來接應的出租車，驅車直往天安門。

1987 到 1989 年間謝三泰任職《自立晚報》時，適逢台灣群眾運動風起雲湧的年代，幾乎每天博愛路、立法院都有陳情抗議活動。當時的重大街頭運動，舉凡機場事件、五二〇農運等等，謝三泰以攝影記者身份幾乎無役不與，還常私下提供拍攝的照片給黨外雜誌和一批反國民黨影像工作者組成的「綠色小組」。

聽到天安門有學運，謝三泰情緒有些亢奮，「我在台灣天天跑街頭運動，沒想到北京居然也有街頭運動可以跑。」

### 「他問我，你是外省人啊？」

當時的他自然不知道，這場運動將演變成一場血腥屠殺。「台灣採訪團的攝影記者多是跑體育的，不太去天安門，畢竟那是危險的工作，可我覺得很刺激。」謝三泰成天揣著個相機奔波，成了人群中的醒目標的。「無論是在北京街道上，或是到天安門廣場，只要我相機一拿起來，人就圍過來了。」

「他們衝著我問，你打哪兒來？」學說兒化韻的謝三泰顯得有點吃力，「我不太清楚對方底細，既然自己中文腔調是南方的，就順勢說我是南方人。還不死心，追問我，南方哪裡啊？靠，我還真不知道要怎麼講，又想了想，我爸媽祖籍是泉州，就改口說我是泉州人。」

「到後來我才慢慢鬆口說來自台灣，有個廈門大學的學生聽我這麼說，就開始跟我用閩南語抬槓。」聽到熟悉鄉音，謝三泰的神情顯得輕鬆不少，可讓他錯亂的事不獨一樁，「還有一次，我跟個學生說我從南方來的，他問我，你是外省人啊？」

圍繞身前攀談的學生固然親切，可跟文字記者分頭行動的謝三泰孤身北京，仍感到頓失所依，「在台灣跑群眾運動，人圍過來的時候要很警覺，要判斷究竟是請願人士，還是所謂的『抓耙子』（編按：指會向官方通風報信的民眾）。幾年記錄運動的經驗累積下來，才慢慢找到方法，譬如跟兩、三個記者群體行動，知道怎麼跟群眾和警方搏感情。」

「可是在北京身邊沒有同業，外表裝沒事，心裡其實一直處在很緊繃的狀態。」當時從當地官方主導的媒體無法得知任何相關新聞，來自學生、文字記者，或台灣報社的訊息都有限。「事後我才知道中南海裡李鵬、趙紫陽之間的政治鬥爭，可當時在現場還真不太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只記得到了 4 月 20 日那天，感覺不太一樣。那一天有點小雨，學生撐傘藉弔祭胡耀邦之名集結，最後整個移師新華門。門裡頭就是中南海，學生和武警發生衝突，開始推擠。」謝三泰說，「我拿著攝影機拍，心想萬一門一開，解放軍就出來了怎麼辦？」



謝三泰指著照片裡寫著「新華門」楷書的橫匾，當時他將相機高懸頭上，拍學生推擠時鏡頭沒有晃動，單從畫面絲毫讀不出記者的忐忑，但如今的他仍心有餘悸，「置身極權國家，會發生什麼狀況，沒有人知道。」

### 「飯店的人聽到聲音他以為你在打電報。」

「我扛了一整個暗房去，放大機、顯影藥水盆、暗袋、沖片罐，還有底片，黑白、彩色和幻燈片都有。」回到下榻的西苑飯店，謝三泰動手改裝廁所，一個大男人委身小室裡沖印放相。「相片洗成 5 乘 7 吋大，5 乘 7 吋就是 A4 一半大小，拍下當天就傳回台北。」

「那時候沒有網路，要傳輸一張照片要透過國際電話線，還有一台我從台北帶去的，由美聯社獨家研發的滾筒傳真機。」他邊說邊比手畫腳，「滾筒大概這麼大，邊上有卡榫，照片附著在上面。一張黑白的照片傳輸過程要 7 分鐘，彩色要 21 分鐘，RGB 的嘛。」

「傳真的聲音也蠻大的，喀啦喀啦喀啦。」謝三泰先是模擬傳真機聲響，然後切換成拍擊聲，「咚咚咚，飯店的人聽到聲音他以為你在打電報，敲門關切，咚咚咚。我打開門，對方問，你在幹嘛啊？我若無其事地說，沒有啊，傳照片。然後拿洗好的體育照片給他看。」

「你知道嗎？電信房都知道你在使用國際電話，時間一久，他們想知道你在做什麼，講白一點，飯店裡頭的幹部都是中共的人。」有時候電信莫名就被切斷了，「斷線就要重來，我天天被傳真搞得很不爽。」

「有一次我怎麼傳都傳不出去，怎麼掛線都掛不上去，掛上去就斷，掛上去就斷。我氣到當下提著傳真機，跑到同業住的另外一家飯店，我付他們一些電信費，就在他們那裡傳真。」謝三泰賭氣道，「說什麼也要把照片傳回去。」

### 「我和文字討論做學生領袖的專題，我選擇王丹。」

在廣場上久了，謝跟學生漸漸熟絡起來，「兩年前《自立晚報》已經在北京大學打響名號了，他們會問我徐璐、李永得怎麼樣？也問我台灣現在怎麼樣？」如今看來，謝三泰有點哭笑不得地說，「我跟他們說台灣很自由，他們也跟我說他們很自由。」

「我當時在現場確實很驚訝，不是一個極權國家嗎？怎麼容許學生在這裡集結這麼久，後來當然知道是裡頭在政治角力，才放縱學生如此。」4 月底前的學運現場，在那官方尚未定性學運、宣布戒嚴和展開鎮壓的時刻，他指認猶在廣場上流竄的樂觀氣息。盯著筆電螢幕上學生衝著鏡頭笑的照片，謝三泰有些出神地說，「當時的政治氛圍說不定比現在還寬鬆。」



1989年5月14日天安門廣場上的王丹。攝：謝三泰

他的鏡頭也捕捉到許多學生領袖拿著擴音器的畫面，包括柴玲、吾爾開希，還有王丹等人。謝三泰隔著相機，將掛戴著一副大眼鏡的王丹，以及他的領袖氣質鉅細彌遺地看在眼裡，「在天安門廣場，我發現王丹這個人講話很有條理，很實在，特別有好感。我和文字討論做學生領袖的專題，我們打算在自立做個半版。」謝三泰向黃德北指定，「我選擇王丹。」

「王丹在天安門廣場上講話很有煽動性，可下台的時候，卻有反差，是個很可愛靦腆的年輕人，要上鏡頭還要整理一下頭髮。」為了製作專題，謝三泰、黃德北跟著王丹中途離場回到北京大學，「不到3坪的宿舍裡塞著6個，還是8個上下舖，我們還參觀他們在學校裡辦的北大沙龍，類似英國肥皂箱的概念。」

「他們生活拮据，可是滿腹理想。我也和王丹聊到他父母對他做這些事的支持，雖然常常他說很多話，然後那北京口音我也不完全懂，你知道。」謝三泰說，「可我心裡很佩服，覺得這個朋友值得交。」

**「那是一種很浪漫，很浪漫的革命情懷。」**

「20多年後王丹來台灣教書，我和他在網路上約好碰面，親手把當時拍他的照片給他。他問我，有沒有打算把這些東西整理成攝影集？我說不行，我跟他說我最大的遺憾就是沒有待到六四。」都幾年的事了，他還是很糾結，「王丹跟我說，沒有全程參與有什麼關係？你參與的部分很少人看到。我說好，你下次回來再說。」

就這樣又拖了七、八年，直到 2019 年八九民運 30 週年的今天，謝三泰終於在台灣攝影師前輩張照堂的煽風點火下，出版他記錄八九學運的攝影集，名為《吼叫 1989》，「我請王丹給我寫序，他二話不說就寫給我。」

我們在桌案兩端，就著筆電光束，瀏覽正處在付梓階段的攝影集電子版。就像王丹所說的，謝三泰以攝影機見證的現場，和那些思及六四，幾乎已成膝跳反射般顯影的畫面——兵臨城下的武裝部隊、坦克人、濺血場景與民主女神像確實不同。

在這群黑白影像裡，無論是北京街頭的常民、自治會的高校學生、醫護人員和電台媒體，甚或武警和解放軍，他們朝鏡頭比劃擺定的多是和平手勢，他們的眼裡和臉上的光彩，混合著某種榮譽感和令人心碎的一派天真。

「這些高校學生文學底子比台灣學生要強，還有人把遺書穿在身上，告訴爸媽，請原諒他們的自殺行動。」看著白布條，因墨漬噴散似仍未乾的口號，他像發現新大陸，驚奇於北京學生運動裡摻混著的濃烈文藝氣息，言談至此他的臉上似有 30 年前、而立年紀的神情，「那是一種很浪漫，很浪漫的革命情懷。」



1989 年 5 月 14 日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絕食的學生。攝：謝三泰

**「戒嚴開始，解放軍一車一車載到二環之外，…… 當時警民相安無事，還特別握手，擺給我拍。」**



謝三泰在北京待了 40 天，幾乎天天去廣場報到，他待的時間或比一般外媒都要長，卻是沒走完全程。5 月 20 日李鵬宣布北京部分戒嚴不久後，報社顧及人身安全，召回了謝三泰。

職是之故，謝三泰親眼見證的浪漫革命最戲劇性的片刻，至多是學生絕食不支送醫的時候：「後來我住到多數外媒駐在的北京飯店，人稱寫字樓，到了晚上喔咿喔咿喔咿（編按：救護車警報聲）不絕於耳，就知道又有學生被送到協和醫院。」

是遊行群眾坐大的時候：「開始有聲援的民眾，包括《人民日報》、電視台都慢慢加入行列。好像是 517 那天，我們從北大走到天安門，走了整整一天。隊伍好長，塞滿天安門廣場，整個都塞滿了。那段路，沒有幾百萬人，塞不滿。」

是解放軍逼近對峙，但尚未執行鎮壓時候：「戒嚴開始，解放軍一車一車載到二環之外，民眾阻攔軍用車，用各種方式圍堵不讓他們進來。當時警民相安無事，還特別握手，擺給我拍。」

是人前激昂吶喊，人後仍有拉撒需求時候：「有把公車拿來當作屏障，也有把公車改裝成廁所的，我就進去過一次。一進去，每個屁股都對向我，學生也是，大媽也是，前後左右都開放的。那味道我不會形容。到現在我還記得那景象，很可怕，我真恨自己，當初怎麼不拍一張照片。」

最多最多，也就是那最後一張民眾朝毛澤東潑漆的照片：「拍那張照片時我真的很緊張，當時已經城管，整個氛圍都不對了。我只敢遠遠的拍，根本不敢靠近。拍完之後我就衝回飯店，沖照片，傳回台灣。」

**「那個時候，他們是有機會變成一個開放的國家的。」**

「召回還好，但到六四之候，我的心情很不好。」回台後，謝三泰輾轉拿到一卷指定轉交給他的錄音帶，「那時候錄音帶很小一個，錄音機也很小，可以藏在懷裡。中國記者朋友在六四現場錄的，可是我實在沒有勇氣去聽。」

終於提起勇氣聽了，「裡頭都是砰砰砰砰的槍聲，好像也有對方在掙扎的聲音。」高頭大個的謝三泰把話說得斷斷續續，「我心裡很不舒服，不知



1989 年 5 月 23 日北京學運期間毛澤東畫像遭潑漆。攝：謝三泰



道從何聯絡對方，根本無從聯絡起。」

2000年初的時候，謝三泰受邀去北京拍照，這才重新聯絡到中國《民族畫報》的另一個記者。「我問他說，這個人跑去哪裡，他說不見了，不知道 哎。」說到這裡，謝三泰把話打住，說要去抽根菸。

「坦白講，30年前的事情，我一直選擇忘記。」根菸成燼，對坐者回來，他的眼裡殘些水沫，鼻翼仍輕微充血。不願回顧，除了缺席的遺憾，恐怕還有一份濃重的無力感。「你知道，在那個訊息不對等的社會裡頭，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採集影像，如此而已。」

「我把我在台灣接觸到的社會運動，經驗和公式套在那裡，去拍那些照片。」謝三泰曾將看顧台灣社會的熱望投向對岸，曾以影像採集過他們眼裡燃起的期待，「回頭看，你會發現那個時候，他們是有機會變成一個開放的國家的。」

相對於小錄音帶裡捲動與迴放的痛楚，謝三泰的黑白影像守護與封存的，是在希望被碾壓敗壞之前，人心還滾燙搏動，難以按捺掩息的理想和激情。

### 「某種程度上，台灣的學運也是跟北京八九學運學習。」

六四之後，謝三泰負氣在核銷單據裡夾了份辭呈，毅然決然離開報社。然而，不出兩、三個月，《自立晚報》還是把他勸了回去，謝三泰和他的相機再次復出江湖，還是照常對準了運動現場。

1990年3月，中正紀念堂的廣場上，九名台灣大學學生拉開了「我們怎能再容忍七百個皇帝的壓榨」的白布條，揭開了野百合學運的序幕。「後來學生成立了全學聯（全國學生運動聯盟），這些學生組織慢慢懂得怎麼跟政府討價還價，具體地提出像是『解散（萬年）國會』這些主張。」

「某種程度上，台灣的學運也是跟北京八九學運學習。」謝三泰從台灣的社會運動拍到八九學運，又回身在台灣學子身上看見被感染的理想和激情。「那個時候，我也是天天陪學生在現場，把一些經驗跟他們分享。」

只是這一次，他走完了全程，也看到了故事的不同版本。野百合學運成功廢除萬年國會，推進台灣民主。自此，台灣和中國的命運在89、90年之交，走上截然不同的岔路歧途。

「後來我輾轉拿到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攝影集，我發現中國官方通過影像，意圖要將八九學運群眾定性為暴民。」說起這事，謝三泰語氣有些高亢，「那些照片遠比我想像的還血腥，屍體多到我看了震撼不已 但他們只片面呈現官方的死亡，通過照片想扭曲事實為：是這些暴民縱火等暴

動行為，致使解放軍不得不展開鎮壓。」

「我在上紀實攝影課的時候，我跟中國交換學生說，中國 1989 年有一個叫做六四天安門事件，知道嗎？他們說，不知道。縱使知道，他們也說不知道。」謝三泰像在繞口令，「他們那是選擇不知道。是家長要他們噤聲，或是家裡和學校根本不告訴他們。」

「我又逼問他們，你們知道當時死了多少中國學生？」30 年來不願提的，謝三泰終究還是記掛在心上。當他發現遺忘成了一種噤聲的策略，他知道，該是時候由他和他的攝影來讓那些被消音的，被再次聽見。

如今面對選擇遺忘的人，謝三泰選擇不再遺忘，他對著他們說，「八九學運時，我 30 歲，在那裡待了 40 天。」

本文獲網路媒體《端傳媒》授權刊登。

端傳媒：<https://theinitium.com/>



# 桃園 農業博覽會

TAOYUAN AGRICULTURE EXPO

5 大專區 16 展館

循環經濟 × 科技農業 × 地景藝術 × 綠色生活

2019.09.28(六) — 10.27(日)

@ 新屋氣象站旁

🔍 桃園事

🔍 桃園農業博覽會





廣告



## 在民主癱瘓之前

### ——從買粉專事件看台灣該補強的網路學分

劉致昕

4月5日，收買台灣粉絲專頁的對話截圖、招募台灣網紅入編對岸政治宣傳部隊的文案在網路上瘋傳。許多台灣公民因此陷入焦慮，紛紛留言「兩岸已進入戰爭狀態」。

同一天，有個政治領袖也很焦慮，擔憂選舉將被外國勢力介入，他祭出政府改組、對公民團體募集創意、大聲對網路公司放話。他是加拿大總理。

4月7日，言論自由日，鄭南榕逝世30週年。除了焦慮之外，我們一起想想，台灣這個年輕的民主政體要在網路時代繼續茁壯，能做點什麼事。

一場風暴，在清明時節的社交網站上發威。從社交網站 Dcard 開始，一直到 Facebook 上由網友集結而成，出現了大部分人沒看過的交易。

「急徵人：支持兩岸友好統一之政治立場的網紅」。從網紅的招募，到粉絲專頁的收購，甚至是人力網站上頭社群編輯的招募文案，大喇喇的從私訊變成了公開訊息。

對許多網友來說，衝擊分成兩個層面。原來，自己每天追蹤的粉專、網紅帳號，是可以買賣轉手的；原來，市場上正大量收購的，是支持中國政治理念的買家，有人甚至直指著來自四川的網紅招募訊息說，就是中國在收買粉專。

衝擊的餘波很多，有人認為小題大作，粉絲專頁的影響有限，可能粉絲太少、可能分眾太偏；還有人認為，粉絲專頁換手經營之後，忠誠度和影響力就會受到影響。但也有人認為，即使是再小的粉絲專頁、再偏的分眾，從俄羅斯滲透美國的案例來看，都會是境外勢力影響國內社會的一環。粉絲頁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在去年（2018），《報導者》專訪臉書緊密合作的數位鑑識實驗室（DFRLab）時，就已揭曉。

當時，DFRLab 剛替 Facebook 做完調查，發現 32 個粉絲專頁，是由非真人帳號操控，這些與俄羅斯過往行徑類似的粉絲頁，正是煽動美國真實世界衝突的火種。有的粉絲頁，同時為「女性及少數族群發聲」，卻又舉辦「停止跨性軍人禁令」活動，還身兼極右派“Unite The Right 2”的活動主辦單位。

## 四川變臉——買不同的粉專變不同的臉

買了幾個粉絲專頁，如同戴上面具，像是四川變臉一樣，面對不同使用者，換上不同的臉，坐擁幾個山頭的粉絲。但同一雙手，也能像操弄皮影戲的師父，用 Facebook 組織實體活動，讓兩大山頭的人同一天上街抗議。

台灣的災情多嚴重，還未揭曉。但如果這些被指認為中國的「買家」，想的跟俄羅斯人一樣的話，收購粉專，就是在收編傭兵。

2017 年，德國、法國大選之年，我與俄羅斯流亡政治領袖之一卡斯帕洛夫（Garry Kasparov）在柏林見面，曾名列普丁（Vladimir Putin）暗殺名單、被國家媒體聲討的他，2013 年流亡紐約後多年與普丁政府交手，他認為俄羅斯打資訊戰，並不真的是要特定人物當選。

「是要耗盡人們獨立思考的能力，所以用海一般的資訊流，提供各種訊息。散播懷疑、混亂、攻擊事實，這樣的攻勢可以同時對左派、右派發起。」

「就算是『好』的公民，也會被骯髒的汙泥戰趕跑，離公民社會、理性辯論愈來愈遠，」卡斯帕洛夫說。

最終，只要透過粉專、不實資訊（disinformation），一個社會裡頭的公民就像是幕後藏鏡人的傭兵，要他們生氣、要他們上街，甚至要他們投票，都有可能。經歷過 2018 年選舉與公投，台灣社會對於不實資訊所造成的社會衝突，傷口都還在發熱。面對 10 個月後的選舉，有些人已如熱鍋上的螞蟻，焦急。

能做些什麼呢？在台灣人目睹粉絲專頁交易的當天，地球的另一端、離選舉只剩 6 個月的加拿大，由政府端出了答案。

## 怎麼避免社會被癱瘓和走向極端？加拿大這樣出擊

這是加拿大所擔心的事：「我們從許多自由民主國家的經驗發覺，這些干預，不一定要確保特定的選舉結果。他們的行為，是要讓我們的社會走向極端、對立，讓我們，作為民主國家中的公民，更憤世嫉俗，對民主的可行性更多懷疑。」加拿大總理賈斯汀·杜魯道（Justin Trudeau）在 4 月 5 號的記者會上說。

從 2017 年開始準備，從今年初，他們開始 4 個方向的作戰，要確保民主程序自由、安全、公平。

### 1. 對抗境外勢力的干預：

- 2017 年 6 月開始做調查，找出網路上對民主程序的潛在威脅，對全民公開
- 發現來自網路對民主程序的威脅，急速上升
- 由資訊安全、警政、情報等 3 個安全單位組成聯盟
- 與 G7 國家建立情報互通、威脅分析、快速回應的網絡

### 2. 加強機關組織的對應能力：

- 情報單位對境外威脅的模式、趨勢進行分析，並發布報告，同時與國際情資進行比對，這將有助於加拿大更精準的定位、指認、回應所遭受到的威脅
- 成立新部門：像由警政系統成立的「境外勢力干預調查小組」、跨部會成立，確保選舉公平公開進行的「選舉安全與情報威脅工作小組」(Security and Intelligence Threats to Elections Task Force)
- 加強政府的跨部門合作，以因應這些新型態威脅
- 提供全國性政黨建議與指南，加強其組織內與系統的網路安全
- 根據最新情報，也展開教育倡議，要讓民眾知情，並習得較好的線上使用行為

### 3. 督促社交媒體與平台採取對應行動：

- 長期與網路平台對話、要求社交媒體負起更大的責任
- 過程保持全面透明公開、隨時向大眾更新

### 4. 為公民做好準備，以 700 萬加幣（約新台幣 1 億 6 千萬元），對公民團體徵求提案，從提案申請到撥款只要兩週，內容包括：

- 培養民眾透過網路有效取得新聞與評論的能力
- 認識網路平台上惡意行為者的手段，並能獨立地辨認出行為者的行動
- 習得不受惡意行為者操弄輿論的知識與能力，不受帶風向手段的影響

看似積極的加拿大政府，其實在 2018 年初，還曾堅定表示不會對不實資訊出手，他們認為這會對政府公信力帶來反作用和後遺症，激起更強的攻勢。過去，他們總認為由平台業者與核實單位結盟，是對抗不實資訊的解方。

但平台業者遲遲不肯動作，加上社交網站上的政治操作證據明確，加拿大民主制度部長多次出訪歐美各國之下，決定必須行動，保護民主程序不受網上干預破壞。



除了加拿大，美國國務院過去兩年灑了 1 億 2 千萬美元，歐盟也再提次高預算，要花 757 萬歐元，招募研究計畫對抗不實訊息。就連加拿大政府自己，也曾支持烏克蘭 250 萬加幣，協助烏克蘭對抗俄羅斯的資訊戰。

加拿大的作法有 3 點值得注意。第一，4 大方向的策略，是由國防部、民主制度部、公共安全部一同透過記者會對外發布的。這不僅考驗跨部門的合作，更代表政府各部門對資訊戰的認定有了共識。這對台灣來說，是一大門檻。

第二，他們強調各黨派都有責任。公共安全部的聲明中如此寫道：「因為境外勢力不斷地試圖影響我們的民主程序和公眾輿論，每一個政黨都有責任，要透過資訊系統的強化、提高警覺，才能停下境外勢力的干預。」也因為不同立場的政黨都作為防護網的一環，加拿大政府開了先例，讓情報單位的定期簡報，即使包括機密性的資料，只要關於境外勢力的網路與實體干預，情報都會提供給各大政黨。

第三，有了法國大選、美國大選的經驗，他們為了投票前的不實資訊與駭客攻防做準備，推出選舉重要事件公共協定 (the Critical Election Incident Public Protocol)。

在聲明中，他們如此介紹此機制：「建立簡單、清楚、公正的程序，讓加拿大公民理解選舉中影響公正性的威脅。以在事件發生時，能有效回應。團隊將由資深公務員 (事務官) 組成，包括國家安全、外交部、民主治理及法律相關單位組成，他們有足夠的經驗認定、理解、通知大眾所面臨的威脅，且確保過程公開、公平。」

這樣的機制不只是關於一次選舉，而是要讓加拿大公民即時得知，緊急事件可能將為害到他們的公民權，剝奪了一場自由且公平的選舉。這是不分黨派都必須認同的重要議題。

以法國為例，總統大選前 48 小時，由 Wikileaks 拋出一份由俄羅斯駭客取得的馬克宏陣營機密檔案，網路上各種號稱是被駭文件的謠言瘋傳，馬克宏陣營卻礙於選前 48 小時規定，不得公開發言。

從事前的教育，到事發當下的反應機制，這是加拿大政府端出來的菜。但加拿大民主制度部部長古爾德 (Karina Gould) 坦言，其中最重要的，還是人民。她說：「最強大的防守就是熱於參與以及知情的大眾，能夠辨認謊言、不實資訊以及輿論操控的民眾，就能免於受害。」

## 人們的「輕信」使假訊息得以發威——例如 ISIS

回到個人層次，其實最殘酷的事實是，人們選擇「相信」社交網站上的訊息，往往並不真的是辯

認不出事實真假，而是根據個人意識形態、政治傾向、人際網絡或是情緒等因素，而按下讚或分享。

換句話說，「認同」，可能才是不實資訊得以發威的關鍵。

將社交網站、不實資訊與認同形塑，發揮得最為極致、最成功的案例之一，便是伊斯蘭國（ISIS）了。

對歐洲國家來說，社交網站上，除了俄羅斯與極右派的結盟，另一端還有伊斯蘭國的力量，要讓穆斯林移民背景的青年走向極端，成為聖戰士。

我在布魯塞爾，採訪了一位摩洛哥裔的比利時母親，她的孩子幾年前投奔了敘利亞、為伊斯蘭國喪命。

與我對話的當時，她開始在校園裡面，推廣新的對話運動。

她告訴我，在孩子喪命的消息傳來之後，她開始調查「為什麼同個屋簷下的孩子，會離家出走、變成另一個意識形態的信徒？」

她發現，現實社會中被邊緣化、家庭溝通的斷裂、學校裡的種族歧視，都是把青少年推向社交網站上黑暗角落的原因，加上同溫層、不實資訊的催化，極端化的作用每一天可能都在發生，最終，網路上猖獗的極端伊斯蘭，成了孩子唯一的認同。

她說，必須從家庭裡開始，重新思考世代、家人、傳統規範之中的對話關係，修補疏遠的人際網絡，創造多元的認同，才不至於因為絕望，或是仰賴單一族群、宗教、政黨的信仰，而失去了對資訊的判斷能力。

換句話說，如果社交網站已被武器化，成為政治勢力的戰場，那麼要對抗藏鏡人發起的資訊戰，包容的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連結、家庭裡的開放對話等，都是「戰略」的一環，愈多的連結，就愈難讓雲端上的刀砍下，將社會斷成N塊。

## 為了更長久的民主，必須行動

從資訊爆炸、資訊失序，到資訊戰，當政治與社交網站結合，瘟疫在世界上傳開，考驗每個民主國家的免疫力。要增強免疫力的方式有很多種，網路平台、媒體、教育、個人、政府，都該有不同層次的回應與行動，才能不讓民主走向癱瘓。這些，正是焦慮之外，真實能做的事。

4 月 7 號是「言論自由日」，是鄭南榕逝世 30 週年，如今，我們再度直面民主的新難題。我們已經花了 30 年，理解言論自由的內涵和打造自由的環境，30 年之後我們也都知道，民主社會就是需要不斷更新的系統，這一場直面，如果真的引起了焦慮，那也該是發現「有新的一堂課該補」的那種焦慮。

這堂新的課，不是為了 2020 選舉而修、不是為了中國干預而修，而是為了在網路時代，民主自由走向下個 30 年、百年而修。

本文獲非營利網路媒體《報導者》授權刊登。

原文網址：

<https://www.twreporter.org/a/opinion-disinformation-manufacturing-consent-buying-facebook-fanpages>

## 深入全球假新聞之都，看「境外網軍」是如何練成的？

劉致昕

在資訊爆炸的社交網站時代，有群「創業家」，在網路平台之間、一張工作桌上，建立起跨國界的淘金生產鏈。他們來自北馬其頓共和國的小城韋萊斯（Veles），上千個青年從製造假新聞之中，淘出跑車、新房，和一場震驚全球的美國總統大選。

2019 年，我們從美國 FBI 的資料、國際組織調查和 Facebook 下架的 2,000 多個粉絲專頁中進一步發現，在假新聞的製造鏈中，韋萊斯不僅是美國總統大選中極右媒體的外包對象，也可能是俄羅斯國家網軍的下游。更重要的是，北馬其頓還在繼續對外做網軍生意，而更有 7 個國家（菲律賓、巴基斯坦、喬治亞、克羅埃西亞、印度、科索沃、阿爾巴尼亞）開始複製「韋萊斯模式」，建立起影響各國輿論的「境外勢力」。

為了認識境外網軍與他們的產地，《報導者》越洋專訪假新聞製造鏈起源的這群「創業家」，和他們的「網軍教練」。

他們是全球最具爭議，也被各國政府緊盯的「創業家」。

「我知道這可能不是最道德的職業，但這真的改變了我的人生，」卓加亞諾斯基（Filip Trajanoski）在電話那端告訴我，今年 25 歲的他，有房、有車，第二次創業也開始 6 個月了，是做 Instagram 上的行銷服務。

改變他人生的，是他創立的個人網站，在過去 4 年，為他帶來至少 25 萬美元收入，「我是比較差勁的，光是我認識的人，就有 3 個人賺了至少 100 萬（美元）。」卓加亞諾斯基來自北馬其頓共和國中部小城韋萊斯（Veles），讓他快速致富的，正是 2016 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眾多操作不實資訊的境外網站之一。當時，北馬其頓至少有 1,000 人在做這筆生意，為準川普支持者建立政治性的內容農場、經營粉絲專頁，大賺廣告錢。

打開卓加亞諾斯基的 Facebook，他具備所有年輕人追求的一切，渡假、健身、一身帥氣的行頭。但同時，他也是 Facebook 和全球民主國家正在「通緝」的對象。

時間回到 2016 年。根據《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報導，2016 年總統大選隔天，歐巴馬（Barack Obama）一整天近乎歇斯底里地抓著幕僚，問來自（北）馬其頓的故事。而選戰中被川普（Donald Trump）擊敗的前國務卿希拉蕊（Hillary Clinton），她的怒火延續到選後一年，

2017 年中，她面對著全場觀眾，細數她選舉落敗的原因，在指出俄羅斯影響大選後，她接著說，「還有那些在（北）馬其頓開假新聞網站的人！」



北馬其頓生產的故事和新聞很多，以下是其中 3 例：

教宗震驚全球，支持川普擔任總統！

ISIS 領袖要美國穆斯林投給希拉蕊！

希拉蕊：「我樂見像川普一樣的人參選總統，他是誠實而且無法賄賂的。」

這些煽動性、經常混雜著事實與謊言而組合成的「新聞」，緊抓川普支持者的眼球，在大選期間「瘋傳」；其中後兩則新聞，至少獲得 50 萬次以上的分享、按讚、點閱，第一則互動數近百萬，還讓教宗緊急召開記者會澄清。更不用說，因為希拉蕊電子郵件資料外洩的爭議，選戰的大半時間，她都在與各種關於她的假新聞對抗。

曾在北馬其頓進行調查的「組織犯罪與貪腐舉報計畫」（Organized Crime and Corruption Reporting Project, OCCRP）記者貝福德（Aubrey Belford）接受《報導者》專訪時表示，這群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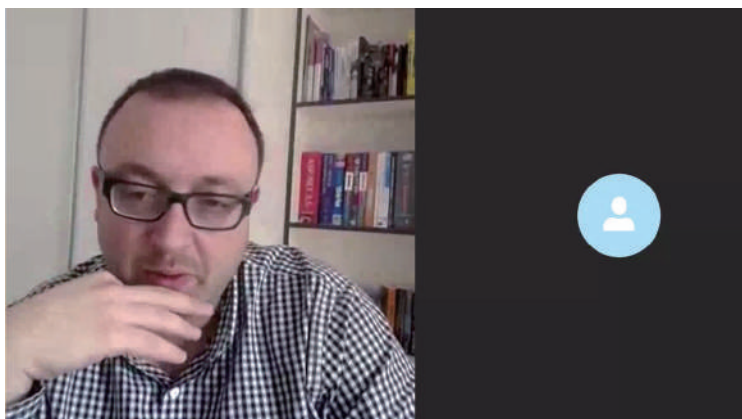
年在 2016 年大選中的角色震驚全球和網路巨擘，但他懷疑，青年失業率高達 5 成的北馬其頓，怎麼能精準抓到美國讀者的口味？又是如何憑空操作社群行銷，創造如此龐大的商機？究竟是誰一開始提供這些知識、技能和經驗？

## 「不小心」幫川普當選的網軍教練現身

帶著這些疑問和好奇，貝福德在去年（2018）開始展開調查。他發現，在北馬其頓青年們大舉建立美國政治網站的前 3 個月，一名經美國聯邦調查局（FBI）認定為俄羅斯國家網軍的幹員，曾入境北馬其頓。他在去年底的發現，引起北馬其頓以及歐洲國家的跟進調查——北馬其頓不只影響了 2016 年美國大選，若其背後與俄羅斯相連，則直接影響西方國家的利益。

同時，在《報導者》過去一段時間追蹤北馬其頓網軍的過程中，我們也從卓加亞諾斯基的 Facebook 頁面上，找到了當時替他架起網站的「幕後功臣」。那是一段自稱為「網路顧問服務」的課程廣告，影片中，一名中年男子乘著快艇、在海洋上享受快意生活的畫面，號召有志投入網路行銷的青年，透過成為「網路顧問」改變人生。

「是他幫我建立網站的，」卓加亞諾斯基說，2014 年，他把從美國打工渡假賺來的積蓄投入一堂 500 美元（約新台幣 1.5 萬元）的行銷課。500 美元——接近北馬其頓人的平均月薪 660 美元（約新台幣 2 萬元）——換來 3 個月的網路課，和一個架好的網站。「接著我就負責每天寫文章，廣告費就進來了。其實也不是真的寫啦，就是複製貼上而已，」卓加亞諾斯基笑說，他從《紐時》、《衛報》（The Guardian）的熱門排行榜上挑文章，改標題、「調整」內容後，直接收割流量。



在假新聞之都，人稱「網軍教練」的賽爾科斯基（Mirko Ceselkoski），接受《報導者》視訊訪問。

金潮裡受惠最深的人。收到《報導者》越洋約訪訊息時，還試圖要求我們付費、遭到拒絕，最終仍接受《報導者》的採訪。

我們循線找上了這名創業家背後的推手。38 歲，也來自北馬其頓，人稱「網軍教練」的賽爾科斯基（Mirko Ceselkoski），如今的他，名片和網站上寫著「（不小心）幫助川普當選的人」（The Man Who Accidentally Helped Donald Trump Win US Elections）。賽爾科斯基近年陸續登上《BBC》、《CNN》、《半島電視台》，是這波網軍外銷淘



「壞名聲也是名聲，是好事吧！」賽爾科斯基面對假新聞帶給他的「名聲」，在視訊訪問中聳肩笑了一笑。

訪談時，他手裡拿著寫有「世界最好老闆」(The Best Boss In The World)的馬克杯，解釋他提供的課程。

「我都教我學生，要讓網站能賺很多錢，就要寫讓美國人有興趣的東西，因為在美國市場的網路廣告收入是最高的，流量也是最值錢的。」在他的網站上，他以教授般的站姿，介紹分為四大模組的網路行銷課程。細看課程描述，會發現他用許多浮誇的字眼，包括「獨家密技」、「你從沒見過」、「川普」等用語，藉以招攬學生。他聲稱，全球已有 11,000 人拜師於他，光是北馬其頓，就至少有 2,000 個學生。

要上網軍課其實不難，一個人繳交近 500 美元，在台灣也能線上學習。如果你人在北馬其頓，就能報名當面授課，課程為期 6 週。「很多企業的行銷部門來上，」他補充。

### 賽爾科斯基的網軍課程四大模組

- 粉絲專頁成長策略：如何創造人流、如何創造瘋傳內容、提供點讚服務。
- 電子信策略：如何取得10萬個以上電子信箱、建立電子信行銷方案。
- 粉絲頁淘金：分析各大平台廣告收入計算模式、如何建立網站賺廣告費。
- 「結盟」策略：如何利用大品牌、受歡迎粉絲頁、競爭對手，拉抬自己的互動數、販售或購買粉絲頁的操作手冊。

## 從商業文嘍到選舉文，發現川普是大金礦

早在美國迎接總統大選、政治變成一門生意之前，賽爾科斯基就在當地開課，小有名聲。他帶著失業青年們，在社交網站、部落格、廣告平台間，摸索出淘金模式。

一開始他們什麼都寫，從健康議題、名人八卦、減肥祕訣、跑車資訊、NBA、人生勵志故事等等，其中，最有名氣的是有「健康兄弟」之稱的維爾馮斯基兄弟檔 (Aleksandar and Borce Velkovski)；他們的網站上，有滿滿的保養、運動、飲食建議，像是「床單下放肥皂，能夠預防半夜抽筋」，或是「增加紅血球數量，喝甜菜糖漿」等內容農場文。這些文章為網站帶來每個月 200 萬個獨立拜訪人次，連健康兄弟經營的粉絲專頁也有 200 萬粉絲。

而隨著各國選舉季的到來，賽爾科斯基看到學生開始嘗試關於美國政治的內容，「他們發現，網友的互動（engagement rate）超級高，簡直瘋了，特別是選前的一年，一樣的手法，卻能創造十倍的互動。」「尤其是川普的觀眾，更願意轉貼、分享、按讚、留言，」賽爾科斯基補充。川普像是北馬其頓人新發現的金礦，沒事做的青年，只要有手機，都想挖礦。

「創造一些對某些政治人物很討喜的文章，把這些內容投放到想要聽到這些東西的人面前，（做到的話），就是你的成功方程式，」賽爾科斯基像是在講課一樣地對我說。

化名 Boris 的青年，是找到成功方程式的學生之一。他用自由開源的部落格軟體 WordPress 創立了健康、運動、名人、政治等幾個不同類型的網站，政治網站上，他還特別選了引誘性的網址，如 newyorktimes-politics.com、politicshall.com；接著，他把文章分享在「My America My Home」、「Friends Who Support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等 Facebook 社團上。他告訴《連線》雜誌（WIRED），其實他也嘗試著創造過關於當時民主黨總統參選人桑德斯（Bernard “Bernie” Sanders）的內容，但結果並不讓人滿意。「他們（桑德斯支持者）什麼都不相信，貼文必須有確實的證據，他們才會埋單！」

Boris 還有 200 個 Facebook 帳號（俄文名字帳號一個約新台幣 3 元，美國名字的帳號一個約新台幣 15 元），靠著這些免費的網路工具、低廉的帳號和他的 TOSHIBA 筆電，他個人的最高紀錄，是一篇貼文被分享 1,200 次，一個月收入 16,000 美元（將近新台幣 48 萬元）。

漸漸地，衰落了 25 年的韋萊斯，成為假訊息假新聞聚落的重鎮。在曾經雇用 4,000 人的廢棄陶瓷工廠和空房間，出現了跑車，年輕人們用手機、筆電，透過網路平台，為韋萊斯挖出了一條新產線，大賺外匯。除了手機、跑車、房子之外，Boris 喜歡去鎮上的 3 家夜店，買百元美金以上的香檳。但，他卻是個不太喝香檳的人，「那是買來噴的！」

## 假新聞出去、錢與權進來！7 國複製「韋萊斯模式」

就這樣，一場網路時代的淘金熱，為韋萊斯贏得「全球假新聞之都」之名，網軍教練賽爾科斯基也大發機會財，如今他宣稱他有來自 4 大洲、9 個國家的生意，他也把生意與韋萊斯的網軍們分享，一同搶別國商業、政治網路行銷的生意。

北馬其頓的故事，當然不是全球假新聞大戰之中的小菜。這群創業家，其實，已成為有心人士的有力傭兵。

2018 年底，貝福德順著俄羅斯網軍的線索調查發現，快速崛起的北馬其頓網軍工廠，與美國本土右翼媒體人高德曼（Ben Goldman）、韋德（Paris Wade）跨國合擊，在 2016 總統大選中，合

作至少 6 個月，他們彼此交換內容、合作刊登、互相導流。

高德曼、韋德兩人在大選之後，被《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直指為假新聞商人，他們在選舉中操作讀者的恐懼與憤怒，狠賺選舉財。後者，還代表共和黨參選 2018 年內華達州眾議院議員選舉，以落選收場。

一個被稱為「韋萊斯模式」（Veles Model）的假新聞內容製造鏈，終於現形了。

遠在北馬其頓的內容農場創業家，就像是代工廠一樣，負責內容的大量複製、生產及快速投放，而在美國境內的政治人物、媒體，則像品牌商，負責下單、品管，靠著代工廠大量生產的內容，在美國市場上創造個人品牌、也為特定意識型態放大聲量。

靠著社交平台的演算法，以及全球廣告串接平台結合而成的商業模式，成本極低，但風險也高。2016 年之後，Facebook、Google 試圖力挽狂瀾，不想讓平台成為被網軍利用的工具。

「我覺得 2020 要再賺一次，是不太可能了，」卓加亞諾斯基解釋他為什麼放下 3 個網站，轉往 Instagram，因為 Facebook、Google 不只快速地擋下廣告分潤，也盡可能封殺內容農場的淘金路線。2018 年，Facebook 加倍了資訊安全團隊，用兩萬名員工的規模，揪出平台上不正常活動的帳號。2019 年 1 月，第一波拿下 700 個與俄羅斯、北馬其頓相關的非原生帳號；2019 年 3 月，則一舉撤下 2,632 個。

「除了平台政策的改變之外，更重要的是競爭對手的出現！」卓加亞諾斯基表示，因為網軍的門檻不高，如北馬其頓般的假新聞製造工廠，已在過去兩年陸續出現在菲律賓、巴基斯坦、印度、喬治亞、克羅埃西亞、科索沃、阿爾巴尼亞等 7 國；這些來自亞洲和中東歐的網軍，製造內容來餵養英國、美國、澳洲等英文市場讀者，從流量中淘金。

最新的案例，是今年 3 月底，澳洲媒體《ABC》發現，有 4 個坐擁 13 萬粉絲的 Facebook 粉絲專頁，不停散發排外的、國族主義的、抄襲的內容，上頭攻擊難民、移民、穆斯林、伊斯蘭教以及立場偏左的自由派政治人物，而發布者的身分則分別來自科索沃、阿爾巴尼亞、北馬其頓。

相關報導中指出，在一天工資約新台幣 300 元的科索沃，一位手握十幾個粉絲專頁的管理者，一天收入可達新台幣 24,000 元，即使經過平台業者的大力取締，至今也還能保持每天新台幣 4,000 元的收入，遠勝一般工資。

從澳洲的案例來看，其中最受矚目的，是境外管理者所管理的粉專中，有些成立於 2013 年，極有可能是不斷換手，交易取得。

## 成為操縱他國選舉與社會極化的彈藥庫

「韋萊斯模式」隨著全球化、網路普及，在任何具有經濟動機的國家發芽，他們一有機會便成為可供他國政治領袖利用的彈藥庫，在社交網站中擊出一發又一發洗腦、煽動的材料，成為別的國家分裂與社會極化的來源。

長期在東歐、巴爾幹半島採訪的貝福德，更以近來跨國集結極右勢力的匈牙利總理奧爾班（Viktor Orbán）為例指出，奧爾班正透過假新聞工廠的支持，以快速在巴爾幹半島創造有利於己的跨國民意聲量。

而這套在網路上跨國創造聲量的戰法，更是極權國家善用的武器。除了俄羅斯和中國之外，3月底 Facebook 官方釋出的資料也揭露了來自伊朗的操作：近 300 個冒充為在地團體、個人、媒體的帳號，複製伊朗官媒的說法，在中東與南亞地區散布，披著在地人外皮的伊朗網軍，透過 Facebook 及 Instagram，觸及 140 萬人。

不管是商業動機還是政治動機，在網路、社交網站上的跨國資訊操作，已是一具由極權政府、民主國家政治勢力、各地低薪青年廣泛交織起來的傳播機器，從 2016 年起至今，不停歇地在各地汲取金流、掀起政治風浪。

放眼未來，在平台大力壓制之下，這股浪，這波金流，還能繼續嗎？

## 面對平台業者宣戰，境外網軍找「在地夥伴」化解？

對 2000 年開始經營網路廣告生意的網軍教練來說，生意看來仍源源不絕。

「社交網站，是個最好的投放工具，」賽爾科斯基說，這筆內容生意，包括生產、投放、社群操作等環節，即使社交網站的遊戲規則變了，只要抓準生意核心，找到對的人，給他們看他們要的東西，還是能創造收入。這收入可以是平台分潤的廣告費，也可以是品牌商、政黨的網路行銷預算，或是提供更完整、跨平台的行銷顧問服務。

但，社交網站的改弦更張，確實對網軍們帶來兩大挑戰。

第一，Facebook 新政策，的確讓網路行銷者，取得數據、內容投放都較困難。但網路行銷顧問，還有更多的新科技或手法，能夠取得使用者數據，例如建立釣魚網站取得 email，或是用硬體設備取得特定距離內的裝置資訊等。透過這些方法取得資訊，就能建立其他內容投放的管道；其中

最常見的，就是電子信、手機廣告。換句話說，要掌握使用者在網路上的眼球，把訊息丟給對的人，還是做得到。

第二，是跨國操作的困難。愈來愈多要求政治廣告透明化、社交帳號透明化的政策，都讓境外勢力影響輿論的門檻變高。網軍的「解方」，則是找到在地夥伴合作。像愈來愈多北馬其頓團隊，聘有美、英等國成員，「如果有在地的夥伴，你就沒辦法分辨這是不是境外來的勢力，」賽爾科斯基說。

我告訴賽爾科斯基，台灣讀者對於中國干預台灣選舉的憂慮，「這對中國來說，他們的資源足夠，同樣說中文，（尋找在地夥伴）不難，」他回答。

網路行銷科技的更迭，跨國的資訊操控，成為當代民主發展、國家安全、民眾認知的最大挑戰。極權國家以封鎖網路方式形成看不見的城牆，但對門戶大開的民主國家而言，除了相對應管理機制的調整、民眾對資訊素養的補足，對抗假新聞的最大關鍵，便是平台業者的角色。

其中，最受矚目的平台是 Facebook。Facebook 網路安全政策負責人葛萊徹（Nathaniel Gleicher）在今年 3 月的公開聲明中說：「即使我們不斷取得進展，發現平台上的濫用行為，但這個挑戰還是會持續存在，因為這些行動背後的行為者，是下定決心且有足夠資源的。」

曾把假新聞形容為「個人的挑戰」的 Facebook 創辦人祖克柏（Mark Zuckerberg），會以多少資源回應挑戰，將證明這家全球社群平台龍頭防制假新聞的決心，這也是各平台都必須面對的問題。

但在這之前，隨著韋萊斯模式在各地生根，我們得為更多不實資訊、假新聞操弄錢、權、仇恨與謊言的世界，做好心理準備。

本文獲非營利網路媒體《報導者》授權刊登。

原文網址：

<https://www.twreporter.org/a/cyberwarfare-units-disinformation-fake-news-north-macedonia>





# 郵保此開始 護所愛



郵政壽險



投保便利  
免體檢



信譽可靠  
服務好



營業據點  
遍全國



低利房貸  
好輕鬆



國民保單  
好幸福



理賠迅速  
有保障



## Is It Inherently Unsustainable to Run a Local, English-Language Media Outlet in Taiwan?

Brian Hioe

The New Bloom Magazine was founded in the wake of the Sunflower Movement in April 2014, of which I am one of the founders, is likely Taiwan's largest English-language independent media outlet at present, if we define independent media as media outlets which are not state-run or corporate-owned.

There is no other independent media outlet which publishes daily articles, with aspirations to eventually shift to publishing two articles daily. New Bloom's Alexa ranking of 525,297 as of August 2019 puts it far above other smaller, independent publications, around 1,400,000 rankings ahead of its closest competitor, but still far below full-scale media outlets such as the Taipei Times, Focus Taiwan, Taiwan News, or the News Lens International.

Indeed, New Bloom is many orders of magnitude smaller than media outlets able to publish twenty plus articles per day as the Taipei Times, Focus Taiwan, and Taiwan News, and it is unlikely that it will be able to grow large enough for that. And New Bloom, which depends on crowdfunding for its finances and does not run ads, is not at all profitable. All members--which are twenty in number currently--are volunteers and our crowdfunding campaign was insufficient to generate enough funds to try and shift to a sustainable model. New Bloom instead atrophies money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though the publication is currently at no risk of collapse because of the fact that funding is inessential to its continued operations outside of the

relatively low expenses it requires to keep the website running.

In this way, New Bloom's existence reflects the unusual media environment for local Taiwanese media outlets that write in English, with a handful of small, independent outlets, no real medium-sized media outlet outside of the News Lens International, and several larger platforms such as the Taipei Times, Focus Taiwan, and Taiwan News.

It is only these small independent outlets, of which New Bloom publishes the most frequently, that write primarily in English. The rest are English sections of larger, Chinese-language publications, with Focus Taiwan being the English section of CNA, the News Lens International being one of the sections of the News Lens, the Taipei Times being the de facto English edition of

the Liberty Times, and Taiwan News owned by I-Mei, likely for the sake of corporate prestige.

The English-language Taiwanese media landscape has shrunk dramatically in the past five years, with the shuttering of the English-language edition of the China Post, the Want Want China Times, and the English-language edition of Thinking Taiwan. Outlets founded in the last six years include New Bloom, Taiwan Sentinel, the News Lens International, and Ketagalan Media.

However, the closing of China Post and Want Want China Times dramatically shrunk the amount of English-language journalism produced in Taiwan, since both were able to produce upwards of ten articles per day. Both were pan-Blue media outlets and reasons for their closure may be political--particularly regarding the proChina slant of the pan-Blue camp and its apparent lack of interest in outreach toward the western world. This was particularly so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2014 Sunflower Movement and the DPP's victories in 2016 sweeping presidential and legislative elections, but also observable in, say, the KMT closing its American offices in 2008 or merging its international affairs office with another department in 2014.

Given their pro-China slant, the news reporting produced by these outlets had evident biases, though the English editions of these publications were not actually always as prone to distributing misinformation as their Chinese-language origin publications. Regardless, the overall amount of information being produced on a daily basis about Taiwan has shrunk in the wake of the closure of both outlets. All of the newer outlets which have emerged in the past five years combined produce less content per day than either the China Post or Want Want China Times.

In a blow to Taiwan's international credibility, resultantly, Taiwan now only has one English-language international newspaper, the Taipei Times. With the Taipei Times and Taiwan News as the largest outlets outside of the state-owned Focus Taiwan, one notes that the English-language news landscape has been pushed further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pan-Green political spectrum. Smaller outlets founded in the last several years as New Bloom, Taiwan Sentinel, and Ketagalan Media slant pan-Green, particularly seeing as some were founded in the wake of the Sunflower Movement.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the pan-Green camp may have a greater interest in outreach to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Yet it is to be noted that the pan-Green camp itself does not seem to realize the significance of English-language media at times.

The Taipei Times reportedly began cutting staff after Tsai Ing-wen of the DPP's election victory in 2016, leading some to even question whether the Taipei Times, too, would be shut down. Moreover, the English-language of Thinking Taiwan, which was an initiative of the Tsai campaign, was shut down after Tsai's victory, resulting in editor-in-chief J. Michael Cole founding the Taiwan Sentinel with funding from Koo Kwang-Ming's New Peace Foundation--though the site is no longer funded by the New Peace Foundation either.

At a time in which greater international outreach would seem to be a priority for the incoming Tsai administration and the pan-Green camp as a whole, English-language media was instead downsized, with greater energy focused on domestic efforts. This would seem to be the risk of running English-language media outlets being part of far larger Chinese-language media outlets--it is all too easy for English-language media outlets to be seen as an unnecessary expense, given their lower readership, and cut in order to save funds.

Yet it is actually possible that Taiwan is just not sufficiently international at present to make running a primarily English-language media outlet profitable. Given Taiwan's international marginalization, Taiwan is in desperate need of international representation, but this will make efforts to run local, English-language media inherently operate at a loss. The only reason why New Bloom has survived for five years is precisely because money was not initially involved, making it unlikely for the publication to collapse if the publication loses funding.

This may also be why it is only smaller, independent outlets that publish solely or primarily in English. For example, the Chinese section of New Bloom, which likely publishes the most in Chinese out of all of these smaller media outlets and was the first of the smaller independent English-language outlets to introduce Chinese translations, is primarily secondary to the English-language section. This is a product of that the Chinese-language section of New Bloom, which was originally intended to operate on equal footing with the English-language section, was unable to compete with larger Chinese-language publications that could offer pay and a larger audience and so gradually shrank in size, primarily publishing translations of English-language articles on New Bloom at this point.

It should be said, however, that frankly speaking, all English-language media outlets in Taiwan suffer from a basic lack of resources and shaky editing--ranging from New Bloom itself to even the Taipei Times. To this extent, much reporting in larger English-language media outlets is not original, but is based off of Chinese-language reporting. Many reporters at English-language media outlets do not come from a news background, but may have entered journalism because



it is one of the few available career options available in Taiwan apart from teaching English, something that affects the professionalism of news reporting--though I hasten to mention that I myself have no news background either.

Smaller, English-language media outlets have proven more adaptable in, for example, having a newer and modern website design, while the Taipei Times, Focus Taiwan, and Taiwan News, as well as the China Post and Want Want China Times in the past, have old and unwieldy website designs. For instance, the search engine of the Taipei

Times makes searching past articles difficult, one observes routine errors on the front page, and at press time, the site does not even have an SSL certificate installed--never mind that this will lead to the site eventually being flagged as dangerous by browsers and will decrease the site's SEO ranking. Smaller English-language media outlets generally dependent on a central figure or small set of central figures to manage their operations, as well--which in the case of New Bloom is myself--something that proves dangerous to their long-term sustainability.

With declining press freedoms in Hong Kong, as observed in Financial Times journalist Victor Mallet having his visa renewal application denied and then being forced to leave Hong Kong, or even physical attacks on journalists during the Anti-ELAB demonstrations, it is anticipated that media organizations that cover the Chinese-speaking world or East Asia currently based in Hong Kong may relocate to Taiwan. This seems to be the logic for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setting up its Asia bureau in Taiwan, or why the first Oslo Freedom Forum in Asia was held in Taiwan in 2018.

It is also clear that the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media outlets with correspondents in Taiwan or even offices in Taiwan is on the rise, as observed in the arrival of Deutsche Welle, the Financial Times, or the Telegraph. However, the infrastructure for English-language local media remains sorely lacking, and at present, a large disconnect exists between local English-language media and more recently arrived international media outlets. Consideration needs to be given to how to develop a mutually stimulat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both English-language local media and English-language international media.

## Press Freedom?

---

Daphne K Lee

Our co-founders were unsure why Marcus Brauchli, former executive editor of The Washington Post, decided to invest in The News Lens in 2013. It was just a six-months-old media start-up then, and they were simply ecstatic about getting their first investor.

But Brauchli reminded them of the bigger picture.

“The Chinese-speaking world is only growing more important in the future,” Brauchli said, as he leaned back in his seat nonchalantly. “And look among the Chinese-speaking countries — Taiwan is the last safe place for journalism.”

From that moment onward, our cofounders went from playing a game of startup survival to shaping The News Lens into a defender of media independence.

Taiwan is ranked no. 42 on the 2019 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 the second-highest ranking in Asia just behind South Korea. As press freedom rapidly deteriorates in Hong Kong, Taiwan seems like an oasis where journalists can report freely without worrying about being disappeared or tear-gassed.

And yet the existence of freedom guarantees neither quality nor diversity in Taiwan’s journalism sphere.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describes Taiwan’s media environment as “dominated by sensationalism and the pursuit of profit.” And I have to admit I was appalled by the quality (or lack thereof) of Taiwan’s broadcast journalism when I first arrived in Taipei during early 2018.

In January 2018, before Han Kuo-yu even dominated the TV presence in every breakfast store, I saw repetitive news reports of drunk-driving, domestic violence, and neighbour quarrels. When I came back to Taipei late 2018, the first news that caught my attention was the public discussion of banning plastic straws.

While plastic waste has sparked global discussions, it turned into a petty debate about how consumers should carry on with bubble teas in Taiwan. Instead of reporting about the actual intention of the plastic ban policy and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plastic waste, news channels decided to exaggerate a legislator's comment on how people should scoop out the bubbles with spoons. A piece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news became a subject of ridicule, a form of entertainment.

Some Taiwanese journalists have blamed Apple Daily for turning sensationalism into a mainstream reporting style. But I've observed an overall lack of awareness on journalism ethics or even what role journalism should serve in local Taiwanese media.

The Taiwanese preference for tabloid reporting is reminiscent of what journalism looked like in the United States before the 1960s. Joseph Pulitzer, a now-legendary figure, was the master of frontpage clickbait in the 19th century, far before the term clickbait was even coined. He was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news publishers who appealed to sensational tastes and patriotic impulses.

It was not until the 1960s that American journalism has undergone structural changes during the Vietnam War, when serious newspapers like the New York Times and the Washington Post ousted circulation tabloids. Television network news that were committed to serious reporting, like CBS Evening News with Walter Cronkite, attracted a mainstream audience and even became today's textbook materials for journalism students.

If we use the U.S. as a benchmark for journalism standard, the history of producing serious and fair news reporting is fairly recent with barely 60 years of progress. And American media is still by no means perfect today.

Taiwan, on the other hand, has an even shorter history of modern journalism. After the 1987 democratization, the Taiwanese media environment was still in its infancy considering the overall timeline of civil society.

If consumer news preference shifts towards quality reporting as we experience political crises or cultural progress, we're hopefully on a trajectory of change. The ongoing protests and civil disobedience in Hong Kong and the upcoming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Taiwan have both accentuated the importance of serious journalism. If there's a time for the news industry to reflect and reform, the time is now.

Beyond the consumer preference of tabloid sensationalism, the disconnect between Taiwanese journalists and foreign journalists is an underlying problem that's easily overlooked. It contributes to the scarcity of quality reporting and narrows the perspectives on Taiwan.

Although Taiwan is becoming the place in Asia where journalists are free to conduct their work, there is hardly any foreign media presence. Deutsche Welle, Reuters, and Bloomberg are the only large Western

media outlets that have sta□, sometimes not even a proper o□ce, stationed in Taiwan.

Influential outlets like the New York Times and CNN have perhaps decided Taiwan was not worth the investment of resources, despite its unique geopolitical landscape and the promise of press freedom.

Solely relying on the very few Taipei-based freelance journalists or expats, Western media outlets would publish a handful of stories on Taiwan each year. They are often about the "rising tension" in the cross-strait as if Taiwan could only be discussed in relations to China or the U.S., and as if Taiwan itself, with a population of 23 million, does not have an identity or a culture of its own that's worthy of press.

The Western media's dependence on a small circle of foreign journalists reinforces a very limiting narrative about Taiwan. International news about Taiwan is often told, not by Taiwanese, but by a few foreign journalists who have parachuted themselves into Taiwan with a premeditated idea of what ought to be reported. The world is reading about Taiwan through a Western interpretation of a few, rather than a fair and balanced truth punctuated with diversity.

What is freedom worth if it comes without quality and diversity?

If Taiwan is indeed the last safe haven for journalism in Asia, the priority then is not to settle in an oasis of pride but to reexamine its media quality and diversity with urgency.

## 2019 無國界記者新聞自由指數 政治局勢變化影響亞太地區之新聞自由

無國界記者組織

**獨裁政權之宣傳、審查制度、恐嚇、肢體暴力、網路騷擾等手段層出不窮，亞太地區國家奮力抵抗各類不實資訊，記者需要更多勇氣才能保持編採獨立。**

在最新無國界記者新聞自由指數中，有兩項指數在 22 個地方大幅上升，突顯一個國家的政治生態對新聞報導自由影響之巨。在馬來西亞，執政聯盟在大選中慘遭出局，這在馬來西亞獨立 62 年的歷史中前所未見。此一空前巨大的改變不但給僵化的媒體帶來一股清新，也轉變了記者採訪的環境，馬來西亞新聞自由排名因而前進到第 123 名。馬爾地夫選出的新總統，競選之初便堅定承諾將提升新聞自由。就任後實現部分諾言，使這個印度洋群島的排名大幅躍進至第 98 名。

### 新聞「黑洞」越陷越深

相比之下，中國、越南的新聞自由狀況卻加速惡化。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越南國家主席阮富仲權力一把抓，不但使兩國排名下滑，甚至幾乎墊底。中國排名第 177，越南名列第 176。2018 年三月，習近平修憲，順理成章當上「萬年國家主席」。阮富仲一人兼任越南共產黨和國家最高領導。無論中國或越南，領導人一方面壓制國營媒體上所有的辯論，一方面無所不用其極地打壓企圖表達不同聲音的公民記者。越南羈押了約 30 名職業和非職業記者；中國羈押的人數將近是越南的兩倍之多。

中國的反民主模式奠基於歐威爾式高科技全面監控和操縱，北京甚至在國際間宣揚此一模式，狀況之嚴重已到拉警報的地步。中國除了干擾在其領土上工作的外國記者，現正建立一套受其管控的「世界媒體新秩序」，企圖監管外國媒體。相關資訊請參見無國界記者組織最近發布的報告。

2018 年七月寮國一處水壩突然潰堤，當局嚴禁記者採訪。這起事件使寮國新聞自由排名因此下滑一名，現排第 171 名。這些採行一黨獨大的國家與他們的北韓「兄弟」越走越接近。北韓因其最高領導人金正恩與美國總統川普會面之舉動，貌似有所開放。排名因此微幅上升一位，位居第 179 名。

### 官方審查和自我審查越來越多

媒體的編採獨立和自由遭到攻擊，但中國式全面新聞控管卻成為效法的對象，越來越常出現在反



民主政權中。新加坡（第 151 名）視自我審查為標準規範；汶萊（第 152 名，-1）、泰國（第 136 名）也都執行新聞控管。同樣地，官方審查也成為柬埔寨（第 143 名）的規範，柬埔寨政府清剿了所有獨立媒體。香港（第 73 名）主流傳統媒體感受需遵守北京命令的壓力。

由於缺乏與當局抗衡的編採獨立，2018 年巴布亞紐幾內亞（第 38 名）和東加（第 45 名）自我審查開始增加。巴基斯坦（第 142 名，-3）軍政權於 2018 年七月總統大選第二輪選舉中騷擾媒體，導致官方審查加劇，情況惡劣之程度與巴國軍方獨裁時期相當。

### 實地調查採訪致命

記者在巴基斯坦現場實地採訪時，面臨極其危險的環境。2018 年至少三名記者因工作而遇害。阿富汗（第 121 名，-3）安全情況更叫人憂慮。儘管阿富汗政府努力改善，但仍有 16 名記者在採訪現場不幸罹難，其中 9 人更死於衝著記者而來的雙重爆炸案。在阿富汗當實地採訪的記者需要更大的勇氣。相比之下，孟加拉（第 150 名）狀況雖沒這麼嚴重，但也夠叫人擔憂。報導示威和選舉的記者往往變成攻擊目標，遭到前所未見的暴力對待。

由於施暴者常常能夠免受懲罰，因此對記者施以肢體暴力便成常見的手段。這狀況依然發生在斯里蘭卡（第 126 名）。2018 年印度（第 140 名，-2）至少有 6 名記者在企圖完成採訪的過程中遇害。來自包括安全部隊、組織犯罪、激進分子等各方的暴力行為不斷增加，導致死 6 名記者死亡的悲劇。

### 網路騷擾和不實資訊

無論是網路上或現場報導，印度記者都常遭到攻擊。敢在網路上批評印度總理莫迪之印度教民族主義意識型態者，一律被歸類為「反印度」敗類，一定要遭到肅清。莫迪政府的態度也促成惡劣之至的網路騷擾大軍集結。莫迪的網軍不只對記者祭出死亡威脅，甚至不惜採用強暴恐嚇手段（網軍特別視女性記者為騷擾目標）。相同的狀況也發生在菲律賓（排名第 134，-1）。除了菲律賓總統杜特蒂政府對獨立媒體發出攻勢以外，精心策劃的網路攻擊也同時出擊。網路新聞網站 Rappler 和其總編瑪莉亞瑞薩（Maria Ressa）便是最具代表性的案例。瑞薩除不斷遭受網路騷擾外，還被迫面對由各個不同政府機關羅織的一連串控訴。

緬甸（第 138 名，-1）使用社群網路的狀況令人憂心。有心者利用臉書散佈不實資訊和反羅興亞人的仇恨訊息，這狀況竟無人控管，還形成有利翁山蘇姬政府的形勢。路透社記者瓦隆（Wa Lone）和覺梭（Kyaw Soe Oo）因調查屠殺羅興亞人一事，2018 年 9 月遭緬甸法庭重判七年徒刑。翁山蘇姬政府對兩名記者的判刑視若無睹。

## 民主政體沈淪

一波接著一波的不實資訊侵蝕亞太地區之民主，連帶損害新聞了自由。不實資訊的散播如披著糖衣的毒藥，叫民主國家難以抗拒。其結果是許多國家在無國界記者新聞自由指數的排名紛紛下滑。有些國家以管制社群網路為名，實行壓抑言論表達之法律而妨礙調查性新聞報導，排名也因此下降。尼泊爾（第 106 名）、薩摩亞（第 22 名）便是其例。

有些國家因缺乏結構性改革而無法擴大新聞自由，這情況使得南韓（第 41 名）、印尼（第 124 名）等國，排名無法進步。此外，如台灣（第 42 名）、蒙古（第 70 名）等則由於媒體環境趨於兩極化，獨立新聞報導的執行極為困難。

## 多元主義面臨危險

媒體所有權集中和商業利益導向導致媒體越來越難維持多元化，日本（第 67 名）、澳洲（第 21 名，-2）便是代表。紐西蘭（第 7 名，+1）雖然也面臨相同狀況，但因紐西蘭法規能避免媒體產權過度集中，紐西蘭排名因此上升一名，顯示主管機關的保障有所幫助。

令人欣慰的是，有些國家雖然狀況混亂，但新聞自由仍獲得小幅勝利。斐濟（上升 5 名，排名第 52）、東帝汶（上升 11 名，排名第 84）、不丹（上升 14 名，排名第 80）雖然是年輕民主政體，國家還走在建設的道路，但其媒體善盡職責，2018 年平衡報導國會大選，排名因此有所進步。由這三國的進步可看出，記者能自由工作，無需擔心遭到騷擾或軍事、政治報復，對民主社會的發展致為重要。

## 無國界記者新聞自由指數

自從 2002 年起，無國界記者組織每年發布世界新聞自由指數的評比報告。全球的媒體、外交人員、國際組織視新聞自由指數為重要的參考依據。

自 2002 年起，無國界記者每年評比各國的新聞自由，發布新聞自由指數作為重要的倡議工具。新聞自由的評比聲名遠播，許多國家領袖對結果的公布感到擔憂，換言之，指數報告對各國政府的影響力不斷提升。全球的新聞媒體、外交人員和聯合國、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皆視新聞自由指數為重要的引用依據。

新聞自由指數根據記者享有自由程度的高低，為 180 個國家及地區進行評分與排名。評估內容包括多元性、媒體獨立性、法律架構的品質、記者的人身安全等。政府政策不在評量範圍內，也不

是個別國家或地區之新聞品質的指標。

透過一份總共 87 題、翻譯成 20 種語言的問卷調查，發給各地知曉新聞自由情況的專業人士，無國界記者得以掌握全球 180 國家和地區記者享有的自由，並輔以質性分析，和記者遭受暴力的資料，計算出各國的評分。問卷調查所評估的內容包括六大面向：多元性、媒體獨立、媒體環境和自我審查、法律架構、透明度、產製資訊的基礎設施品質。

自 2013 年的調查開始，評量分數範圍設定為 0 至 100，分數越高就表示情況越差。如此的評分方法，讓新聞自由指數容易理解，也更易於進行跨時間比較的縱向研究。無國界記者組織計算兩種分數：第一種分數是涵蓋六大面向之問卷調查的結果；第二種分數是結合問卷調查的結果以及記者遭受暴力的資料。一國的最終評量分數取兩者之中的高分，這是為了防止低分（排名前端）可能造成的偏誤，尤其是新聞遭到高度控管，而記者幾乎不太受到暴力的國家。

## 台灣：對抗不實資訊，無國界記者組織提出五項措施

**隨著不實資訊對於台灣各界所造成的威脅逐漸攀升，無國界記者組織提供五項策略以強化台灣的媒體環境**

在無國界記者組織於 2019 年發布的新聞自由指數報告中，台灣的排名雖然維持在第 42 名，但卻未能延續前六年蟬聯亞洲第一的成績——相較之下，南韓則在今年以第 41 名躍居亞洲之首。在台灣，政府部門鮮少直接干涉新聞自由，如果發生也不會受到容忍；但對記者而言，一方面飽受政治兩極的媒體環境所苦，另一方面，也缺乏有效的保護措施以維持記者的編採自主權。

在過去的數十年間，台灣隨著解嚴而促成了媒體自由化，然而，歷代的執政者不當詮釋「新聞自由」，並以此為由的「不作為」，媒體被棄置而為私人利益所競逐，帶動訴諸腥羶色以及無止盡追求利潤的風氣。而公共媒體，理應在媒體商業競爭的支配之外，但在始終沒有充足的經費資源及自主性的情況下，面對商業媒體霸權，難以實踐提升大眾公共討論品質的使命。因此，台灣的閱聽眾越來越難以劃清新聞媒體與娛樂之間的界線。

### 壓制並非解方

中國政權正是利用了台灣媒體環境的脆弱，向普遍在中國擁有商業利益的媒體經營者施加壓力。除了這種控制日益加劇以外，北京政府也有發動不實資訊攻勢之嫌，意圖擾亂民主制度。2018 年 9 月，台灣駐日本大阪辦事處處長蘇啟誠，遭抹黑攻擊指控其於颱風期間棄台灣公民而不顧，間接導致該名外交官自縊身亡。這樁悲劇說明不實資訊攻勢的威力。

面對這類不實資訊的攻擊，台灣當局僅以有待商榷的報復手段作為回應。例如，拒絕發簽證給被認為懷有敵意的中國記者，或者，在未有明確流程的情況下，對社群媒體施壓以刪除所謂「假新聞」。然而，僅以壓制的手段作為解方，非但沒有讓台灣脫離不實資訊的危害，更可能因此削弱了台灣的民主體制，還偶然幫了意圖摧毀台灣民主的人一把。

### 強化媒體環境

無國界記者強調，對抗不實資訊的唯一有效應對策略，在於大幅強化媒體環境的品質、多元性以及自主性，如此自然能對不實資訊免疫。

無國界記者建議聚焦在以下五個關鍵領域：

- 維護編採獨立：擬定相關規範，有效確保新聞記者的編採獨立性不受媒體老闆或董事會的影響；減少濫用誹謗訴訟對付記者。
- 所有權透明：揭露媒體直接或間接的所有權，實行最高度的透明，讓閱聽眾充分得知任何可能的利益衝突。
- 強化公共媒體：大幅提高公共媒體的經費資源，並強化編採獨立。
- 發展獨立調查媒體：積極實施經濟和財務方面的優惠政策，鼓勵並支持獨立調查媒體的發展。
- 加入新聞信任計畫：鼓勵台灣媒體參與「新聞信任計畫」(Journalism Trust Initiative) 認證，該計畫旨在推廣並獎勵遵循專業規範與倫理的媒體。

### 無國界記者台灣分會

無國界記者組織近期成立了台灣分會，以促進相關各方實行上述建設性政策。分會依法在台灣註冊，為一非營利、非政府組織，強化在地連結，使得兩年前在台北設立的辦事處更加完備。

無國界記者台灣分會結合了在地與國際的專精，在媒體品質和新聞自由的討論上，能充分發揮。無國界記者組織確信，藉由強化在地媒體環境，台灣能夠成功對抗不實資訊，並且為新聞自由與民主帶來持久的改善。

艾瑋昂

無國界記者組織東亞辦事處執行長

無國界記者台灣分會理事長



## 2019 RSF Index:

### Asia-Pacific press freedom impacted by political change

RSF

**With totalitarian propaganda, censorship, intimidation, physical violence and cyber-harassment, a lot of courage is needed nowadays to work independently as a journalist in the Asia-Pacific countries, where democracies are struggling to resist various forms of disinformation.**

The 2019 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 compiled by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RSF) shows how hatred of journalists has degenerated into violence, contributing to an increase in fear. The number of countries regarded as safe, where journalists can work in complete security, continues to decline, while authoritarian regimes continue to tighten their grip on the media. With totalitarian propaganda, censorship, intimidation, physical violence and cyber-harassment, the Asia-Pacific region continues to exhibit all of the problems that can beset journalism and, with a virtually unchanged regional score, continues to rank third from last.

Two significant rises in the Index – both of 22 places – highlighted the degree to which a country's political ecosystem impacts the freedom to inform. In Malaysia, the ruling coalition was ousted in an election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country's 62 years of independence. This blew fresh air through the ossified media and transformed the environment for journalists, propelling Malaysia to 123rd place. In Maldives, the election of a new president who had given firm – and partially kept – promises to improve press freedom enabled this Indian Ocean archipelago to jump to 98th place.

#### News “black holes” sink further

Conversely, two countries already festering near the bottom of the Index – China and Vietnam – both managed to fall another place, to 177th and 176th respectively, because of the monopoly of power exercised by their presidents, Xi Jinping and Nguyen Phu Trong. The first amended the constitution in order to be “president for life” in March 2018. The second now heads both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state. In each country, the ruling elite suppresses all debate in the state-owned media while cracking down relentlessly on citizen-journalists who try to make a dissenting voice heard. Around 30 professional and non-professional journalists are detained in Vietnam, and nearly twice as many are detained in China.

China's anti-democratic model, based on Orwellian high-tech information surveillance and manipulation, is all the more alarming because Beijing is now promoting its adoption internationally. As well as obstructing the work of foreign correspondents within its borders, China is now trying to establish a "new world media order" under its control, as RSF showed in its latest report on China.

Laos also fell one place to 171st, above all for preventing journalists from covering the dramatic collapse of a dam in July 2018. These one-party states are inexorably drawing closer to their North Korean "brother", which managed a miniscule one-place rise to 179th thanks to the semblance of an opening as a result of the summits that brought Supreme Leader Kim Jong-un and President Trump together.

### **Growing censorship and self-censorship**

While the islands of press independence are under attack, the Chinese system of total news control is increasingly serving as a model for other anti-democratic regimes such as Singapore (151st), which has established self-censorship as the norm, Brunei (152nd, -1) and Thailand (136th). Similarly, censorship has become the norm in Cambodia (143rd), where the government has eliminated all independent media, and Hong Kong (73rd), where the leading traditional media now receive pressure to comply with Beijing's dictates.

In the absence of editorial independence vis-à-vis the authorities, Papua New Guinea (38th) and Tonga (45th) also saw an increase in self-censorship in 2018. In Pakistan (142nd, -3), the military establishment's harassment of the media in the run-up to the general election in July 2018 resulted in an increase in censorship comparable to the worst moments during Pakistan's military dictatorships.

### **Deadly field reporting**

Reporters are also exposed in the field in Pakistan, where the environment is extremely unsafe. At least three were kill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work in 2018. The security situation is even more worrying in Afghanistan (121st, -3), where – despite the government's efforts – 16 media professionals were kill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reporting, nine of them in a double bombing that explicitly targeted the press. Much courage is now needed to be a field reporter in Afghanistan. Although less dramatic, the situation was also worrying in Bangladesh (150th),

where reporters covering protests and the election were the targets of unprecedented violence.

Physical violence against journalists is encouraged by the fact that the perpetrators usually enjoy complete impunity, as is still the case, for example, in Sri Lanka (126th). In India (140th, -2), at least six journalists were also killed while trying to work in 2018. This tragic toll was accompanied by an increase in violence coming from all quarters, including the security forces, organized crime and political activists.

### **Cyber-harassment and disinformation**

India's journalists are being attacked online as well as in the field. All those who dare to criticize Prime Minister Narendra Modi's Hindu nationalist ideology online are branded as "anti-Indian" scum who must be purged. This results in appalling cyber-harassment campaigns in which journalists are threatened not only with death but also rape (as the troll armies like harassing women journalists, in particular). The same phenomenon is found in the Philippines (134th, -1), where attacks against the independent press by President Rodrigo Duterte's government are accompanied by coordinated cyber-attacks. The most emblematic case is undoubtedly that of the news website Rappler and its editor, Maria Ressa, who is the target of both recurring on-line harassment campaigns and a series of prosecutions orchestrated by different government agencies.

The use of social networks is also worrying in Myanmar (138th, -1), where disinformation and anti-Rohingya hate messages spread on Facebook without being moderated, benefitting the government led by Aung San Suu Kyi, who reacted with a deafening silence to the seven-year jail sentences imposed on Reuters journalists Wa Lone and Kyaw Soe Oo in September 2018 for trying to investigate the Rohingya genocide.

### **Democracies swamped**

These waves of disinformation are helping to erode democracy throughout the region, and press freedom with it. Democratic countries are having more and more difficulty in resisting this toxic groundswell, with the result that many are failing to improve their ranking in the RSF Index. On the grounds of regulating social networks, some countries such as Nepal (106h) and Samoa (22nd) have, for example, adopted repressive laws that hamper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The absence of structural reforms that foster greater press freedom is also preventing countries such as South Korea (41st) and Indonesia (124th) from progressing. And independent journalism is rendered extremely difficult when the media environment becomes too polarized, as in Taiwan (42nd) and Mongolia (70th).

### **Pluralism in danger**

Finally, it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difficult for media pluralism to resist the imperatives of media ownership concentration and business interests, as in Japan (67th) and Australia (21st, -2). New Zealand (7th, +1) is exposed to similar phenomena, but has a regulator that was able to prevent too much media concentration. It therefore rose one place, in a sign that institutional guarantees pay off.

Some modest victories have been seen in this otherwise disturbing landscape. By providing balanced coverage of general elections in 2018, the media in Fiji (up 5 at 52nd), East Timor (up 11 at 84th) and Bhutan (up 14 at 80th) fulfilled their role, although still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in these young democracies. The progress achieved by these three countries showed that enabling journalists to work freely, without fear of harassment or reprisals, is important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s development.

## **The RSF Index, the reference for press freedom in the world**

**The 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 published annually by RSF since 2002, is a point of reference used by media throughout the world as well as diplomat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Published every year since 2002 by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RSF), the 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 is an important advocacy tool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emulation between states. Because of its notoriety, its influence over governments is growing. Many heads of state and governments fear its annual publication. The Index is a point of reference that is quoted by media throughout the world and is used by diplomats and international entities such as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World Bank.

The Index ranks 180 countries and regions according to the level of freedom available to jour-



nalists. It is a snapshot of the media freedom situation based on an evaluation of pluralism, independence of the media, quality of legislative framework and safety of journalists in each country and region. It does not rank public policies even if governments obviously have a major impact on their country's ranking. Nor is it an indicator of the quality of journalism in each country or region.

The degree of freedom available to journalists in 180 countries is determined by pooling the responses of experts to a 87-question survey devised by RSF that is translated into 20 languages. This qualitative analysis is combined with quantitative data on abuses and acts of violence against journalists during the period evaluated. The criteria evaluated in the questionnaire are pluralism, media independence, media environment and self-censorship, legislative framework, transparency, and the quality of the infrastructure that supports the production of news and information. Scores are calculated on the basis of the responses of the experts selected by RSF combined with the data collected by RSF on abuses and violence against journalists during the period evaluated.

Ever since the 2013 index, countries have been given scores ranging from 0 to 100, with 0 being the best possible score and 100 the worst. This makes the Index more informative and easier to compare one year with another. RSF calculates two scores. The first is based on the first six of the seven indicators listed above. The second combines the first six indicators with the seventh (abuses). A country's final score is the greater of these two scores. This method prevents inappropriately low scores (high ranking) being given to a country where few or no acts of violence against journalists take place because the provision of news and information is tightly controlled.

## Taiwan: RSF recommends 5 measures to fight disinformation

**As disinformation poses a growing threat to Taiwan's institutions,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RSF) recommends five measures to strengthen the media environment.**

In the 2019 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 published by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RSF), Taiwan still ranks 42nd but has lost its top spot in Asia that it had held for the previous six years to South Korea (41st). Although interferences from the executive power are rare and less tolerated in Taiwan, journalists are suffering from an extremely politically polar-

ised media environment and the absence of an effective protection of their editorial independence.

The preceding governments, as they liberalised the Taiwanese media sector over the past decades, have consistently misinterpreted “freedom of the press” as a reason for abandoning it to private interests, therefore encouraging sensationalist bidding and unrestrained pursuit of profit through their inaction. The public media has never been provided with sufficient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independence needed to carry out their mission of elevating the quality of debates in the face of a hegemonic commercial press. As a result, it has been increasingly difficult for the Taiwanese public to differentiate journalism from entertainment.

### **Repressive Answers Not A Solution**

The Chinese regime exploits the vulnerability of the Taiwanese media environment by putting an increasing pressure on media owners, who often have business interests in China. In addition to this growing control, Beijing is also suspected of orchestrating online disinformation campaigns aiming to destabilise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The smear attacks accusing the Taiwanese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Osaka of abandoning their citizens during a typhoon in september 2018, which led to the suicide of Taiwanese diplomat Su Chii-cherng, is one sad example of the power of such campaigns.

The only response from the Taiwanese authorities to such attacks were questionable retaliatory measures such as refusing visas to a Chinese journalist regarded as hostile or pressuring the social media to delete so-called “fake news” without due process. But a solely repressive answer, far from protecting Taiwan from disinformation, is likely to further weaken its democratic system and involuntarily help those who want to destroy it.

### **Strengthening The Media Environment**

RSF insists that the only effective response to disinformation lies in substantially strengthening the quality, plurality, and independence of the media environment, so it will naturally become immune to the attacks.

RSF recommends to focus on five key areas:

- Put in place regulations that effectively protect the editorial independence of journalists from their employers and boards of directors and discourage the abusive use of defamation suits against journalists;
- Impose the greatest transparency on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ownership of media, so that readers can be informed of any conflicting interests;
- Dramatically increase the amount of financial resources allocated to the public media outlets and reinforce their editorial independence;
- Encourage and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independent investigative media outlets through a proactive economic and fiscal policy;
- Encourage the Taiwanese media to join the Journalism Trust Initiative (JTI) certification project, which aims to promote and reward media outlets that comply with professional norms and ethics.

### **RSF Taiwan Chapter**

As a way to encourage Taiwan to implement such constructive policies,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RSF) has recently established a Taiwan Chapter. This locally-registered, non-profit NGO completes its East Asia bureau opened in Taipei two years ago by giving it a stronger local presence and increased media connections.

By combining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expertise, the RSF Taiwan Chapter is now able to fully contribute to the Taiwanese debates on media quality and press freedom.

RSF is convinced that, by strengthening the local media environment, Taiwan will be able to successfully fight against disinformation and bring durable improvements to press freedom and democracy.

Cédric Alviani

Head of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RSF), East Asia Bureau

Chairman of the RSF Taiwan Chapter

## 記者手記： 在新聞現場，如何應對風險，保護自己？

Lulu

「如果你尚沒有過報導暴動或衝突情形的經歷，我的猜測是，你遲早會遇到的。」講台上，史蒂夫（Steve Cook）一邊打開題為「失序公共空間」（Public Disorder）的演示文稿，一邊半開玩笑地說道。

7月，在巴西亞馬遜州瑪瑙斯（Manaus），普立茲新聞基金給一批報導雨林議題的記者安排了為期四天的「惡劣環境和急救培訓」（Hostile Environment and First Aid Training，簡稱HEFAT）。台上的史蒂夫，在過去的三十多年裏一直在各種衝突地區從事安全工作，負責介紹危機評估和應對。在座的幾十名記者，除了我以外，都來自拉美國家，對涉及公共環境下的暴力場景不陌生。

我在培訓開始前請他務必講到暴力衝突情境——為了能夠轉達給在香港的編輯部同事。大型新聞機構可以臨時加強報導升級事態時的應對。而獨立媒體或獨立記者常常不會有這樣的資源，在場的這些拉美記者，也多是「自學成才」。

並非是做記者的，就會陷入危險境地。但幾十年來，世界各地的衝突狀況不斷，戰地、黑幫、暴亂、爆炸……而新媒體時代又讓媒體變得更貼近第一現場，以前是大機構支持的專業記者的工作，現在也常常要由更小的媒體機構和媒體人負責。儘管我是一個跟蹤長線議題的文字記者，通常不會第一時間出現在有切實危險的新聞現場，也常常獨來獨往。但其實，身在國際組，我的題目常常出現在陌生國家的偏遠地帶。目睹周遭環境的變化，無論是理性衡量還是親身證明，安全意識都應當在一名記者的職業素養中，佔更重要的地位。

### 記者遇險數據2018

根據「無國界記者」的數據，2018年，在新聞報導中，全球有80名新聞採寫人員身亡，60人被劫為人質，348人遭遇禁錮，3人失蹤。在殉職的80名記者中，13人是非專業記者，4人是媒體僱工。49人是在被針對性殺害，31人是在報導中意外身亡。其中有77名男性，3名女性。44例死亡發生在衝突地區。在過去十年間，共有702名職業記者遇害。

我寫下這篇手記，複述了幾位專業人士在應對挑戰重重環境時的一些思路，分享給記者編輯同



僚，也希望可以分享給主動挑戰陌生環境的讀者。這些年，我越多地抵達以前覺得遙遠的角落，也越多地覺察寰球同此涼熱。科技好像改變了一切，卻不會主動幫助我們去衝破人與人之間阻隔。如果糟糕的事情不期發生在身邊，多一分技能，多一分安全意識，都多一分屬於自己的力量。

## 風險評估計劃

採訪目的、計劃（主要時間點、去哪裏多久、主要會面對象、可能的風險）、目的地（地圖、衝突、衝突後、恐怖主義、犯罪、綁架 / 拘留、交通、惡劣自然環境、健康、旅途信息）、採訪風險（受訪對象是否會有風險、採訪隊伍的性別 / 年齡 / 種族 / 宗教 / 國別 / 殘疾是否會給其他人造成風險）、旅行計劃、裝備、住宿……

翻開培訓準備的一個滿滿9頁A4紙的「風險評估」樣本，還未看完，我們幾個記者對視一眼：「這也太複雜了」、「我們不是戰地記者來着的」、「其實我們的精力更多是放在跟蹤採訪線索上頭」、「很多都沒辦法事前知道的」、「但其實自己國家的情況，差不多都已經知道了」、「這是要給每個採訪計劃寫一本《Lonely Planet》嗎？」……

「有個人被稱作『倫敦橋雄獅』（Lion of London Bridge），」史蒂夫給各種媒體工作了這些年，知道記者都不願被人說教、派活，改用說故事的方法講課，「2017年6月倫敦橋恐襲，當三個持刀恐怖分子闖進一家餐廳的時候，絕大多數在場的人都僵住了，不知如何反應，只有這個人最早反應過來，開始向襲擊者大吼，他這一吼讓其他人脫離了僵住的狀態，這才開始逃走。」

「這個人為什麼能迅速反應過來呢？因為他是資深球迷，對足球暴力十分熟悉，因而在面對恐怖分子的時候，也能迅速回神。」

緊急氣氛下，我們是會逃、會反擊還是會僵住？軍人常用一個名為「OODA loop」的決策方法，循環進行觀察（Observe），調整（Orient），決定（Decide），行動（Act）。就連過馬路也不例外，只是這一決策過程我們訓練已久，過馬路可能遇到的情況也很熟悉，觀察調整決定和行動的速度極快。

而要想在一個陌生環境、在陌生危機發生的當下做出敏捷、有效的反應，能做的有兩件事：第一，降低風險，第二，預判風險。只有知道在遇到特定風險的時，我們準備對此做出什麼反應，才能夠在事件發生時，最迅速地提取出這些信息。

面對危險，有兩項「風險評估」是可以預先做的。

一是通訊計劃。「實地小組打算如何報告其行動和情況的細節。他們會與誰通話以提供最新消息，

他們會多久打來一次電話？他們備有定位設備嗎？如果錯過了安排好的報備計劃，後方將採取什麼行動？」

二是醫療計劃。「即時反應：你將如何立即對醫療緊急情況、受傷或傷亡作出反應？穩定：你會到哪裏去？在國內有什麼地方可以穩定傷者／病人？撤離：你如何將穩定的傷者轉移到一個確定的護理中心？」

堅持定時報備，即便失聯，後方也能知道前線記者最後一次報備的地點；知曉應急計劃，若失聯，後方也知道最先聯絡哪些醫療或援助機構，排除失聯原因（譬如錯過兩次報備，後方就會開始應急程序）。採訪環境複雜時，更詳盡的準備也會有益。譬如準備詳細的地圖，並給關鍵地點標碼，報備的同時附上 GPS 或預先準備的標碼（例：「X 月 X 日，一切安全，在 A2-A3 之間」）。作為後方，也應當建立完善的「失蹤機制」（負責到人）。

危險的可能性讓屋子裏的氣氛凝重。儘管綁架這樣的事情一定不會發生，我一邊自我安慰，但既然必須防患於未然，就算是出現手機被盜的情況也能用上，一邊匆匆在筆記本上寫下一串待做事項：

1. 背下一個信得過的朋友／同事的電話號碼（一定不能是父母的號碼）；
2. 在家裏留一個信封，裏頭寫一條個人信息（確保這一信息無法用任何公開渠道查出，若被綁架，則以這條信息證明還活着）；
3. 寫遺書；
4. 背一首詩、牢牢記住一個美景良辰（若絕望、用來回憶）。

做好這些準備不僅僅是以策生命安全，也是儘可能讓人和親友保持良好的精神狀態。前車之鑑無數。以極端的綁架為例。培訓提及綁架時，列出了兩個例子：某記者被綁後，只記得自己母親的電話，因而成為接下來耗時一年多的談判中，與綁匪對接人，因此，這位老母親不得不被迫聽到自己女兒連續幾個月被性侵和被折磨的整個過程；某記者在被綁後只是一味極力反抗，被鎖在了一個坑裏而另一個記者則在被綁期間做到了與看守的家庭交好，雖然兩人都安全回家，但精神狀況不可同日而語。

## 險境中如何應變

「Prepared Does Not Mean Fearful」（「有準備，並不意味着害怕」），培訓中的這一結論，對於我——一個體格較弱的女性以及一個長時間在陌生環境採訪的記者，這是最有意義的一句話。我想，對於很多常常獨自出行的女生，在面對家人朋友常常會做出的「女孩子出門太不安全了」這類提醒時，也是有益。

這句話，來自經歷了二戰的一位陸軍上校庫珀（Jeff Cooper）。庫珀發明了一套「庫珀顏色代碼」（Cooper's Color），適用範圍則遠超過狙擊手應有的技能。這是一套簡單的代碼，用來標註我們的注意力狀態：

1. 白色：對周圍無意識，對任何狀況都毫無準備。
2. 黃色：有警覺周圍環境、身邊人的肢體語言，但也冷靜和放鬆，而不是偏執。在這一層級時，很難被驚嚇到。
3. 橙色：警覺度提升，感到不對勁，評估和制定應對計劃，以避免進入下一層級。
4. 紅色：回應開始，採取果斷和立即的行動。

簡單地說，除非身在最為安全的環境中，否則有意識地培養自己處在「黃色」狀態下，才是最佳的心態。現實中，我們身處「白色」狀態的無意識和無準備其實很常見。敏捷度，來自當下對周圍環境的觀察，也來自事前對突發事件的應對計劃——越有準備，越能應對。

在「阿拉伯之春」的抗議現場，很多在場的記者都遭到了親政府一方的暴力襲擊，有腿部被刀刺、被毆打、被性騷擾等。如果把面對襲擊時視作一個人最脆弱的狀態——把這個人想像成中世紀的國王，坐在城堡深處抵禦外敵，地窖、衛兵、高牆、護城河都是國王變得脆弱的情形發生之前的防禦措施：沒有哪一項防禦機制，可以取代另一項。

無論是記者個人還是媒體作為一個團隊，維護記者的安全，一定不是在事情發生時才做出的緊急反應，而是事前的一系列準備。

以報導群體暴力事件為例，越多地知道抗爭雙方的來歷，便越知道他們在動用武力時候的策略和升級路徑（譬如警方的武力從防護盾牌、警棍、胡椒噴霧到水槍、橡膠子彈；而來自抗議者的武器則常常包括磚頭、石塊、高爾夫球、汽油彈、煙花、汽車或各種自制簡易炸彈）。

在研究和獲知抗議路線的時候，就可以一併研究逃避路線、設置安全地（比如租賃抗議區域的公寓）。將抗議範圍標註在地圖上是很基礎的一步，這樣也能清晰地看到爭執的中心（無論是單個還是數個），應當確保記者不會長期呆在最中心地帶（適時離開也可以有機會審視局面）、在抗議的邊緣安排人手接應（可以派人駕車或者駕摩托車在邊緣地帶巡迴）。

**有準備，並不意味着害怕；保持警戒，不意味着便可以逞英雄。**

此外，不做單獨行動、隨身攜帶基本的急救工具（譬如止血帶，以防大出血的情形）、用 WhatsApp 等工具提供實時地點、保護頭部（譬如棒球頭盔既保護頭部也不顯眼，同組記者可以

戴一樣的颜色容易辨別組員)、戴防護口罩、穿厚褲子防劃傷大腿、女性記者可以穿一層連體泳衣以防性騷擾等等，這些也都是在衝入人群前，應當考慮到的事情。

事前能夠準備的，還包括一些在人群中被圍困時自衛的方法：要想衝出人群，最好的方法是用自己的手肘，用一隻手環住自己的脖子，手肘向前，低頭、彎腰直直往前衝，兩人聯手更有效；若被人制住，立即想到可以用筆、用手機等物品來反擊。此外，還有基本的急救：如果被催淚瓦斯襲擊，備着檸檬塊、醋或洋葱，迅速嚼一下，可以緩解，用涼水清洗眼周但不要渾身澆下去；如果被胡椒噴霧襲擊，不要用水，不要用手去碰眼睛，使勁眨眼睛引發淚水，或用肥皂（最好是嬰兒用的）沖洗眼周。

### 催淚彈

催淚彈是以CS (C<sub>10</sub>H<sub>5</sub>ClN<sub>2</sub>)、CR (C<sub>13</sub>H<sub>9</sub>NO)、辣椒素等一系列化學物質為基底製造的化學武器的統稱。其中CS在各國軍警中運用最為廣泛，CR於1962由美軍合成，是一種更強效的催淚毒氣。

而最後一層防禦，大概便是我們對身邊環境的敏捷度，庫珀顏色提醒我們注意周邊環境、OODA loop 提醒我們在做出決定之前要有判斷。

具體到人與人的緊張情緒，史蒂夫舉例道，如果兩個人在激烈的鬥嘴中，最先揮拳的很可能是更為害怕的那一個。

地震、海嘯、火宅、化學爆炸、車禍……「現場」指引着媒體，但在那個記者都備着的「突發新聞行李箱」裏，安全評估和預防措施，佔多重要的位置？進入化學爆炸區，隨身攜有污染檢測儀嗎？進入地震災區，做好各方準備了嗎？有準備，並不意味着害怕；保持警戒，不意味着便可以逞英雄。

沒有任何一條新聞，值得用生命去獲得。

### 壓力無處不在

四天的培訓下來，綁架這樣極端的例子讓學員們安靜下來，而另一堂也讓人屏息的課程，則是抑鬱。

慣常在戰區或武裝衝突地區工作的史蒂夫給出的建議是，離開衝突地帶或事件的4到6周之後，



記者的精神狀態需要得到再一次的評估——第一次評估應當在 48 小時內，而當時的情緒，在 4 到 6 周後是否得到緩解？持續的壓力，可能被「回歸正常」的生活狀態掩蓋，卻也可能是抑鬱症的前兆。他／她沒有什麼動力去做喜歡的事情嗎？有些離群嗎？有沉浸在酒精、性或毒品上嗎？

### **不一定要激烈的暴力衝突，才會給記者心中「壓力的杯子」注入不可承受的重量。**

「新聞行業在對待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這件事情上，至少晚了其他行業十年，」史蒂夫說。記者接受的安全培訓極少，卻常被一下丟在衝突的最前線，心理影響常被低估。

不一定要激烈的暴力衝突，才會給記者心中「壓力的杯子」注入不可承受的重量。在講抑鬱症的短短一個小時課程間，一位來自委內瑞拉的記者聽到一半情緒失控，慌張離開。若換個場合，她神采飛揚、談吐自信，很難察覺她持續報導委內瑞拉新聞時，必然面臨的巨大心理壓力。「怎樣面對社會的撕裂？」知道我在培訓，同事丟來無人能回答的難題。我隱約覺得，眼前這些來自截然不同社會環境的記者們，也有相似的掙扎。

記者是一個孤單的職業，誰也不知道下一個採訪、下一個故事，會給自己帶來怎樣的影響。很可能出現的情況，還有無法消化自身壓力，直接轉移到家人、孩子、伴侶身上。懂得自檢、願意尋求幫助；細心觀察身邊同僚、給出援助。兩者相加，大概就是最好的防禦了。

如果願意的話，還有一些專門為記者建立的心理諮詢平台，譬如「The Mental Field」。創始人之一是前泰晤士報駐莫斯科的記者安娜（Anna Mortimer）。她的父親是一名戰地記者，1989 年在中美洲國家薩爾瓦多（El Salvador）遇害。「那時我 19 歲，覺得父親強壯、迷人、不屈服，總得來說很酷，」安娜寫道，「但直到後來我才意識到，他長期以來一直焦慮不安，酗酒成癮，可能還受到了工作中經歷的恐怖事件的創傷。正如一位訃告作者所言，父親「悔恨、孤獨」，身後跟着一連串災難性的人際關係。」

「在我自己的分析中，我也經歷並承受到父親心理層面的干擾給我帶來的傷害。通過對精神分析的思考和閱讀，以及對患者的培訓，我明白了這些生活在人類體驗邊緣的人，心理健康是如何被嚴重影響的。獨自熬過難關，沒有得到幫助，是沒有回報的。」安娜的話，說給每一位記者聽。

最後，筆記本裡還剩下這些貼士：

- 一、若在已知有被綁／襲擊／拘留的地方工作，則儘量不要有規律地出門，不要有可被追蹤的生活習慣。「Routine kills」（規律習慣帶來危險）。

二、木頭擋不住子彈。人跑不過手雷。小小的手槍，30 米開外很難射中。受重傷的被綁者，不值錢。

三、找到並熟悉在不同環境下，在最短時間發出自己定位的方法。有用的手機 APP：

- 1: What3words ( 只要雙方都使用該系統，這是比 GPS 還要簡單的定位方法 )
- 2: Pocket Earth 和 Maps. Me ( 兩者都適合在沒有網絡時使用 )
- 3: 視風險，使用衛星電話和追蹤器。

四、持續積累急救知識，救人救己。

五、更新對疫苗的認識。

六、熟悉下面這幾個致力於記者安全的機構：

- 1: Rory Peck Trust：致力保障獨立記者的安全和福利的機構
- 2: The Frontline Freelance Register ( FFR )：向所有在外國工作的獨立記者開放註冊會員
- 3: ACOS Alliance ( A Culture Of Safety Alliance )：致力在世界各地的編輯室、自由撰稿人和記者身上植入安全文化
- 4: The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 CPJ )：致力捍衛記者安全報導新聞而不擔心遭到報復的權利

本文獲網路媒體《端傳媒》授權刊登。

端傳媒：<https://theinitium.com/>



發行單位：台灣新聞記者協會

發行人：鄭超文

主 編：曾俐璋

執行編輯：陳益能、曾俐璋

排 版：許瀚月

封面設計：林綉雪

製版印刷：美藝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售價：新臺幣 180 元整

初版：2019 年 9 月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

會長：鄭超文

常務委員：安德毅、李志德

執行委員：吳柏軒、柯淑齡、馬小蘭、黃以敬、潘俊宏、劉嘉韻

常務監委：黃子明

監察委員：林注強、涂建豐

地址：台北市信義路二段 88 號 6 樓

電話：(02) 2341-0044





「胡蘿蔔」



「古坑咖啡」

「番薯」



# 雲林良品 YUNLIN 美味上場

歡迎大家多多採購  
食得安心



「椴木香菇」



「茂谷柑」







# JUST FLOW

雨  
電

主辦單位 —— 台灣電力公司。

共同主辦 —— 臺中市政府、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交通部觀光局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執行單位 —— 嶺東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研發中心。

設計單位 —— 樸實創意、中間研究室。



# 法流

回望水力發電百年身影，重返原初的電力源頭……



TAICHUNG

ACT .01 台中

SEP 06 ——— 29

台中 文化部文化資產園區 —— 台中市南區復興路三段362號

Cultural Heritage Park, Ministry of Culture  
No.362, Section 3, Fuxing Road, Southern District, Taichung City

NANTOU

ACT .02 南投

OCT 04 — JAN 05<sup>2020</sup>

南投 日昇月恆藝廊 —— 南投縣魚池鄉中山路599號

Xiangshan Visitor Center  
No.599, Zhongshan Road, Yuchi Township, Nantou County

TAINAN

ACT .03 台南

OCT 08 — JAN 05<sup>2020</sup>

台南 臺灣歷史博物館 —— 台南市安南區長和路一段250號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History  
250, Section 1, Changhe Road, Annan District, Tainan City



# 通流



富市台中 · 新好生活

# 公幼公托 倍增計畫

UP!!

實現中!

108~111學年度預計增加

公幼公托倍增計畫提供平價、優質與近便之教保服務，減輕家長育兒經濟負擔，讓孩子在安全、舒適、快樂的學習環境中生長。



180個

公共化幼兒園班級  
(2~6歲幼童)

14間

公設民營托嬰中心  
(0~2歲嬰幼兒)

4間

社區公共托育家園  
(4名專業人員照顧12名0~2歲的嬰幼兒)



更多資訊請至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網站  
或洽04-2228-9111  
分機37500查詢